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香港九龍衙前圍村歷史與文獻專號

〈九龍衙前圍村歷史與文獻〉出版緣起

· 張瑞威

九龍衙前圍村吳氏祖先的追尋

· 張瑞威

吳渭池傳略

· 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

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

· 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

七十年目睹的東九龍社區變化

· 吳佛全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大學客家研究院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四十五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ihome.ust.hk/~schina>

〈九龍衙前圍村歷史與文獻〉出版緣起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2006年12月9日，將是九龍衙前圍村第廿九屆（十年一屆）太平清醮的正日。（有關醮會儀式日程，可參考附錄。）香港的學者們對打醮並不陌生，在宗教的意義上來說，打醮是「侍陰侍陽」，祈求闔村平安；而在現實的意義上，打醮亦是村落向外顯示財富和團結的機會。不過對於衙前圍村的原居民來說，這次的打醮卻具有深一層的意義——從清朝雍正時期開始，衙前圍村民每十年進行一次打醮，三百年來從未間斷，但面對市區重建，遷拆在即，這一次大概是該村最後一次的打醮活動了。對研究本地歷史的學者來說，這次活動也極富象徵意義，原因是衙前圍是九龍現時僅有的舊村，所以當12月10日醮會的終結，可謂正式在九龍的明清以來的宗族社會上劃上了句號。

筆者最早踏足九龍衙前圍村是在2000年，當時與游子安和卜永堅兄共同接受了黃大仙區議會的委託，編寫《黃大仙區風物志》，在編寫的過程中，筆者負責了「古舊村落」一節，遂開始了這個村落的研究。研究的期間，筆者多得吳九鄉長、梁錫麟先生、吳佛全先生、何其強先生、林文輝先生等等的幫忙，收集了族譜、碑刻、筆記和口述歷史。《黃大仙區風物志》在2003年出版後，筆者將該區搜集得來的各種文字資料複印一份，送給了華南研究中心收藏。這批資料，有兩份是前衙前圍鄉長吳渭池（1884-1975）在臨終前的自述，分別是〈吳渭池傳略〉和〈初期出海的中国海員〉，均自衙前圍村村代表梁錫麟先生得來的。據梁先生說，這兩篇自述均是他的「契爺」吳渭池在臨終前一年（1974）向他口述，而由他即席筆錄而成。

吳渭池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香港的第一代工會領袖，他於1884年4月1日出生於衙前圍村，父親從事耕種，農閑則在渡船工作，因家境貧

困，吳10歲才上學，但只上了一年「開蒙」，便因父母雙亡被迫輟學，為鄉民放牛以得溫飽。1901年開始，17歲的吳渭池開始他的海員生活。由1901年至1909年，先後在不同的外國商船上工作，先由德國「地亞時號」，轉至該國另一艘商船「黃忠號」，又轉至英國商船「變窩力號」、美國「德哥打號」、「中國皇后號」、「西伯利亞號」以及加拿大「俄國皇后號」，月薪也由最初的三元逐漸遞升到二十元。1909年，吳渭池時26歲，在日本橫濱參加了孫中山為推翻滿清政府而組織的「聯義社」，利用海員的身份，暗中運送反清郵件、彈藥，甚至護送革命黨人進出中國和日本。1914年，當船停泊在溫哥華時，吳渭池與其他海員在船上召開了一次工人集會，組織了「公益社」，規定社員在每次出海時繳納社費一元，若遇社員在航行中遭遇意外或生病，由公益社撥現金三十元，以應急需，至於其他津貼，則視乎情況而定。1916年，吳更以「公益慈善社」的名稱在香港正式註冊，有會眾三千，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前身。

吳渭池也是老革命，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吳在事件後加入了共產黨。為了配合抗戰，他在船上和港口屢次進行募捐，每次航行都能募集到一、二千元，以救濟傷兵和難民。1939年，更趁「加拿大皇后號」入塢大修，吳發動了船上三十多名工友，組織慰勞團，吳親為團長，旅惠陽探訪正在抗日的東江游擊隊，獲得當地六百多名游擊隊隊員並隊長曾生的歡迎。1940年，吳渭池57歲，結束他四十年的海員生活，返回衙前圍村居住。但鄉村的生活並未使他忘卻國難，他帶了一子一姪起程去東江交給曾生參加游擊隊，當時香港的幾家報紙均刊登了消息，以大字標題「送子從戎」以作表揚。此外，他又改革吳氏宗祠內的義學，並親任校

長，聘請南方學校四名進步教員負責執教，日間開辦小學，夜間則舉辦青年國語進修班，時日夜就學人數多達二百人，經費主要來自吳氏宗祠。

有趣的是，吳渭池也是地方精英。1941年，日軍開始攻擊香港，在戰爭期間，香港治安非常惡劣，衙前圍村公舉吳渭池為鄉長，主持村內一切事務。吳在村中組織了維持治安的自衛隊，使衙前圍村免受匪徒的搶掠。由於衙前圍村在當時比較太平，遂吸引了不少「出嫁女」返鄉避難，一些圍外的富人，也要求給予保護。1941年底，日軍開始佔領香港，香港治安雖回復正常，但經濟的崩潰令許多人捱餓，吳渭池憑著他略懂日語的方便，向日本軍方要求配給糧食，結果為村民爭取到十大麻包大米，每戶分得五斤，渡過短暫的難關。日治時期，日軍為拓展啓德機場，遷拆了附近的上下沙埔、蒲崗、新舊隔坑、上下元嶺、石鼓窿、打鼓嶺、沙地園、豬屎寮等一帶村落。衙前圍村雖不在清拆之列，但住在圍外的部份村民卻受到影響，許多被日軍遷徙至九龍塘模範村，在吳渭池極力爭取下，日軍始同意在模範村以石建屋，並委任吳為村長。未幾，吳從軍的子姪被日軍俘虜，並在赤柱監獄就義，而吳亦被舉報為問題人物而被捕，受盡酷刑，後得友人四出運動，並以數千元作為擔保才得以出獄。為免再被逮捕，吳遂遠走惠陽，直至光復，才重返香港。

1945年光復後，吳渭池重回香港，仍然在香港海員與衙前圍村村民中有極大的影響力。這年，他組織了「香港海員工會」，1948年，被工會會眾選為主席，連任十多屆，直至1961年才退休。退休後的吳渭池仍積極參與衙前圍鄉的鄉務，時值香港政府為大建徙置區，要向衙前圍村收回吳氏宗祠所在土地。吳渭池仍任鄉長，往訪廣東省長陳郁和廣州市長曾生尋求援助，這使得吳氏在日後能爭取到較佳的賠償，除了補回土地重建祠堂外，更獲准建立至德學校，以延續以往在祠堂內的義學。1975年，吳渭池以91歲高齡與世長辭，但在去世的前兩年，得義子梁錫麟的協助，完成了〈吳渭池傳略〉和〈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兩份自述手稿。

總括來說，這兩份材料詳細記錄了20世紀初一個香港海員的經歷，包括他如何由農民而成為海員，並以此職業為生約40年；由如何在退休後以個人的閱歷和積累的財富擔任了鄉長，使衙前圍村渡過艱難的日治時期。其實這種經歷在香港甚至華南社會中並不罕見，但少有文字記錄留下來，因此這部傳記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這傳記所記錄的不只是個人的瑣碎事情，更是與香港甚至中國的整體政治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前年，華南研究中心主任蔡志祥兄，在閱看這兩份資料後，建議整理出版。於是，筆者便開始與中心秘書黃永豪兄籌劃出版事宜。我們當時的想法是，既然這兩篇資料是村民自己的東西，我們便盡量保持原來的文字，不作刪改，只在懷疑錯別字的旁邊加上括號，寫上我們認為對的正字而已。與此同時，為了豐富內容，筆者開始聯絡和鼓勵其他村民寫上他們自己的故事，結果成功找到了吳佛全先生寫下他在戰時的經歷，更難得的是他繪畫了當時村落的分佈圖，這對我們研究九龍歷史有很大的作用。在筆者力說之下，梁錫麟先生也記錄了一些曾與衙前圍村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不過由於敘述過於零碎，為著增加閱讀的方便，筆者代他合湊成一篇文章，經梁先生的審閱後，也同意是他的意思。

這個專號，是衙前圍村幾位村民的自述。但為著增加讀者對衙前圍村歷史的了解，筆者寫下了〈九龍衙前圍吳氏祖先的追尋〉，作為開首的文章。

九龍衙前圍村吳氏祖先的追尋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引言

衙前圍是九龍的古老村落，筆者首次踏足這條村落並進行研究是在2000年，當時的衙前圍村雖已面對大地產商的收購和拆卸的危機，但圍內的結構仍然清晰可見，它的主門設於東面，上書「慶有餘」，全村呈長方形，有明顯的中軸線，盡頭是供奉天后的神廳，在中軸線的兩邊，各有六條橫巷，左右對稱，屋宇整齊排列其間。各屋規格相等，約十呎乘二十呎，村民稱為「一分地」。雖然村民習慣認為衙前圍是由吳、陳、李三姓人組成的雜姓村落。不過，隨著吳氏的發展，在2000年，大部份村內房屋的業權已是由吳氏擁有。

目前衙前圍村分作四房，是以廣東十一世的祖先吳廣玄、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作為代表。四房之中，以第四房日玄祖的人丁最旺、財力最大，所以到十九世時，日玄祖的子孫再分四房，分別為德高祖（四房一）、俸高祖（四房二）、翰高祖（四房三）和仕高祖（四房四）。一直以來，日玄祖各支均積極編修族譜，目前找到的族譜，如民國7年（1918）的《吳氏重修族譜》與民國26年（1937）的《吳氏家乘》同樣是四房四支譜，二者內容大體一致，只是《吳氏重修族譜》記至廿二世，而《吳氏家乘》則記至廿五世而已。另外廿五世孫吳揚森先生收藏的《吳家族譜》也是四房四的記錄，但比較簡略，也缺年份，相信是他個人從上述族譜節錄出來。廿六世孫吳世明也收藏了一部他自己本房的族譜，但缺年份和名稱，從內容考察，這是屬於四房一的支譜。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衙前圍村吳氏，要到1986年才編修出一部代表四大房（廣玄、東玄、泰玄和日玄）的族譜，亦即是目前所見的排印本《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即是如此，四房四在這一部族譜中仍有著超然的地位，除了來自該

房的廿五世孫吳詠棠（或吳文川）親自作序外，族譜的開首更放置了四房四始祖吳仕高及其子吳臣任的夫妻畫像。¹

本文的目的是敘述衙前圍吳氏對其祖先理解是一個不斷轉變的過程，在以下的部份，我們將可發現吳氏族譜中有關其祖先事蹟的敘述，與近年村民自己所講的大相徑庭。這個轉變，反映了宗族在不同時代的需要；而考察的過程，則有助於我們對華南宗族的了解和九龍早期地方歷史的認知。研究材料方面，除了以上的族譜資料外，還依賴大量經筆者和其他學者所做的訪問記錄。

(二)典型的珠三角宗族故事

吳氏擁有華南地區大部份宗族的特徵，包括有一個極為顯赫的貴族遠祖。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吳氏的始祖是周太王的長子泰伯，泰伯雖為長子，但寧願將天下三讓與三弟季歷，自己舉族南遷，由陝西岐山避居至當時仍屬於荊蠻之地的江南無錫。在泰伯之後，到春秋時期，吳氏又再出現與泰伯具有同樣賢德和貴族身份祖先延陵季子，該族譜記載：「壽夢公生四子：長諸樊公、次餘祭公、三餘昧公、四季札。札賢而義，曰不可遜讓，長而嗣之，以此封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屬浙江之地，今名常州是也，後子孫皆以是稱。」可見無論泰伯或延陵季子這些吳氏祖先，均是不戀棧帝位的賢者。吳氏將自己的遠祖上結至遠古的名門望族，無非是要說明自己的祖先是來自有高度文化的中原正統，而非被稱為「南蠻」的廣東土著可比。除此之外，吳氏也憑著其祖先的貴族背景，得以「合法地」建立起本族的祠堂。²目前所見，衙前圍吳氏宗祠建於圍村的右側，門前對聯是「箕裘綿世澤；支派享延陵」，而祠內的「至德堂」壇上，所置放的木主也被書上「延陵堂上歷代祖先考妣

之神位」。村民告知筆者，「延陵」是古代高尚的名銜，他們的祖先得到這個名銜，遂傳之後代云云。³

衙前圍吳氏既將祖先的淵源定在中原，使到宗族的日後發展便必須有一段「南遷」粵東的插曲。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記載，南來廣東的始祖為吳氏七十世祖吳居厚（1078-1158），關於他的生平，族譜有如此的記載：

公初遷豫章洲東湖，字敦老，號重本，長子鼎。公在宋徽宗時，初為武安二節度推官，後舉提河北建閣，歷官至樞密院事。徽宗王尊崇佛法，屢諫致怨，父子失儀，火燒而罷。退回家後，胡虜邊犯南侵。徽宗俾攜北去，至于靖康元年大亂，四方鼎沸，民不安席，後厚公攜家眷至南雄府舉兵救主，弗期，軍兵預知調用，就被南雄下屯集民兵五千餘眾。不料天不從人，公生七子，守制不能操駕，人心澆薄，不可勝數，遷於合同場暫住，將父所遺產物，議七子均派，各擇處安身，散處各地，買業開基。

族譜這部份的記載，存在許多難以理解的部份，例如當徽宗被擄，為甚麼身在河南的吳居厚要千里迢迢來到廣東招募義兵？又例如靖康之難是發生在靖康元年（1126），但吳居厚死亡的年份是在1158年，亦即是南宋紹興二十八年，是否意味吳居厚用了32年的時間在南雄組織義兵，卻一直沒有作戰？⁴這些漏洞與矛盾，顯示了族譜編修者在「追憶」祖先過程中的大意。不過，撇開這些漏洞和矛盾，族譜卻清楚地解釋了吳居厚南來廣東的原因。他的南遷，是為著到廣東招兵以營救宋徽宗，只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而既然大事沒成，他的七個兒子，也就索性在各地置業開基了。

南遷廣東，下一步當然是定居九龍。這個過程，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記載，吳氏一共經歷了八代，居厚之後，五子吳最成為吳氏南

來廣東的二世祖，他卜居東莞縣吳家涌；吳最生二子，長子念二亡失，次子念五，成為三世祖；念五生將士（四世祖），將士生七五（五世祖），七五生三樂（六世祖），三樂生六萬六（七世祖），六萬六生從德（八世祖），從德生成達（九世祖），而成達就是衙前圍吳氏的開基祖。目前衙前圍村的廣玄祖、東玄祖、泰玄祖和日玄祖四房祖先，就是吳成達的四位孫子。前述的吳氏宗祠，就是以吳成達祖的名稱登記，而由這四房各選一名司理共同管理。

雖然吳成達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吳氏族譜中對這位衙前圍的「開基祖」卻記錄不多，據《吳氏重修族譜》（1918），吳氏本居於東莞，到吳成達這一代，他攜帶著父親吳從德和「先公骸骨」，「過江」遷居至新安縣的官富司及衙前圍等處。族譜中有關吳成達的資料非常少，甚至連他的生卒年份也欠奉。

從一些蛛絲馬跡看來，村民曾相信他們的祖先是在元末明初才於衙前圍定居下來的。在1976年，村民在圍內天后宮內豎立「廟史」碑刻，上載：「歷史悠久之慶有餘衙前圍村，本建業於元末明初年間，是為公元1352年，距今六百二十餘年矣。」⁵1982年，衙前圍鄉長李富在一篇介紹其圍村的歷史中則表示，吳、陳、李三姓祖先真正遷入衙前圍居住是在明朝初年，他說：「明初洪武三年至建文二年（1370-1400）本圍原居民始祖陳朝賢祖、李成規祖、吳成達祖族人自東莞遷來官富場（九龍城）。……起初居於九龍城侯王廟何家園附近，土名為荔枝園。當時因地處偏僻，常受流寇劫掠，居住不寧，於是在明永樂年間（1410-1424）遷居至衙前圍現址。」⁶李富是李成規祖的後裔，而據他的說法，吳成達便顯然是明朝初年15世紀時候的人了。

簡單來說，吳氏的族譜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族的故事：先是在宋代由地處粵北的南雄遷到三角洲，然後經過數次遷居，大致在明代初年定居下來。顯然，吳氏的祖先包括泰伯、延陵季子、吳居厚、吳日玄、吳成達等數十代的祖先事蹟，均不是信史的記錄，而是許多代之後衙前圍的吳氏定居者在追尋遠祖過程中的

認知，所以內容固然有不少推斷，漏洞和矛盾也是難免發生。故此，我們應有的問題不是這些遠祖是否真實可靠，而是這些遠祖及其事蹟是在一個怎樣的歷史環境下追尋出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則往往關連著一個宗族的肇基。

(三) 宗族的開始

根據天后宮內的「廟史」碑刻，吳氏自明朝初年開始，一直在九龍地區輾轉流徙，直至清初雍正年間，才正式連同吳、陳兩姓建圍定居。碑文說：

……蓋明初時胡虜南侵，海盜猖獗，民因避亂，輾轉遷徙，迨至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始得安居樂業，聚吳陳李三族姓氏建村開井而居，雖世變滄桑，而遺跡尚存，圍內之天后宮歷史久遠，村民仍皆奉祀天后元君，七約鄉民為崇德報功，例定十年一屆太平清醮，藉以酬謝神恩，第一屆創於雍正丙午四年（公元一七二六）時至丙辰（公元一九七六）已第廿六屆……。⁷

這碑刻顯示衙前圍的建築時間是在1724年，而且在建圍的兩年後，衙前圍村的雜姓居民即聯合附近其它村落進行首次的太平清醮活動。

雖然吳氏在九龍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並於雍正二年建圍定居，但並不意味著宗族的建立。宗族的建立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它是一系列儀式性和制度性建設的結果，諸如設立祖嘗、修建祠堂和編修族譜等等。⁸ 據《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在清嘉慶八年（1803），二十世祖吳臣任（1751-1823）重修其九代之前的祖先吳日玄（十一世）位於九龍元嶺村附近的墳墓。吳臣任這個行動，意味在嘉慶初年居住在衙前圍的部份吳氏，正嘗試建立一個以日玄祖為祭祀中心的宗族組織。吳臣任也有可能曾編修族譜，因為當這房的子孫在1918年重修吳氏族譜（即《吳氏重修族譜》）的時候，曾表明他們是根據「舊本」編輯而成的。

即使吳臣任於嘉慶年間曾編修族譜，那次的編修工作也相當粗疏，所以在1918年當日玄祖的子孫根據「舊本」修撰《吳氏重修族譜》的時候，便立即發現「舊本」的世系存在一個嚴重漏洞——即在十一世祖日玄祖之後，便立即記錄十六世的朝鳳、存鳳、達鳳、廷鳳和美鳳，缺載了十二至十五世的祖先。當時就著這個問題，編修者曾造訪耆老，最後也沒有肯定的答案，只能懷疑是「清初海氛未靖，遷民以避，輾轉流亡，慘不忍述。迨康熙初年，准還原鄉，因而遺失數代，無從稽考。」但是這個說法，對於廿四世孫吳煥琪來說，仍然有問題。他在1937年編撰《吳氏家乘》的時候提出了疑問，指出既然說是遺失了四代資料，那麼為何《吳氏重修族譜》所根據的原譜又以朝鳳是日玄祖長子，存鳳是日玄祖次子，達鳳是日玄祖三子，廷鳳是日玄祖四子，而美鳳是日玄祖五子？「何謂遺失四代？」面對自己提出的疑問，吳煥琪稱自己也「未敢臆測」，所以在《吳氏家乘》的有關記載上仍是原文照錄。1986年，衙前圍的吳氏又再重修族譜，這一次是要編寫一部代表四大房的《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在這個時期，作為編修者的廿五世孫吳詠棠再度將這問題提出來考證一番。他認為清初遷界，初遷起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復界止於康熙七年（1668），前後只有7年，不可能因而有數代之遺失。再在假設吳成達是明初時候或稍前時候人下來計算，遺失數代之事應發生在明中葉的倭寇期間。⁹ 似乎由於初修族譜時的過於大膽假設，加上日後吳氏子孫的過於小心求證，吳氏雖然經過一百多年的重覆考證，即使在1986年的族譜中，仍然不能補回十二至十五代的祖先。

吳氏宗族的更大發展應是在清末。光緒二十年（1894），衙前圍吳氏建立起祠堂，這對於聯繫鄉親情誼，起了很大的作用。《吳氏家乘》（1937）作出了讚嘆式的描述：「在衙前圍之西方營建祠宇數楹，崇祀先靈，規模雖少，聊伸追遠之忱，老幼聯歡，共聚鄉親之誼。」這個吳氏宗祠原本位於東頭村北東隆道旁，因1962年政府徵地的關係被迫遷徙至現時圍村的旁邊。重遷祠堂，固然牽涉一些改變，例如建築物的結構由兩

進改爲單進，不過據衙前圍村土生土長的村民吳佛全先生（71歲）告知，無論新舊吳氏宗祠，在管理上一直是由吳成達祖以下的四房司理共同負責。

至此，我們大概可以進行一個初步的結論或者假設：到19世紀後期，居住在衙前圍村的日玄祖後裔，與其他吳氏組織起來。他們以吳廣玄、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四位同代的祖先作爲血緣的紐帶，而宗族的祭祀中心則定在這四位祖先的祖父吳成達祖，並以吳成達作爲整個衙前圍吳氏宗族的控產名稱。不過，因爲吳成達缺乏顯赫的功名，修建祠堂便缺少了一份合法性，這使得吳氏有需要將祖先上溯至古代的延陵季子，使到無論吳成達或其他吳氏子孫，均繼承了貴族的身份，於是建祠祭祖便完全符合清朝的法律了。而經過這一個改變，吳氏不單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宗族，同時也出現了四房。1918年編修的《吳氏重修族譜》，雖是日玄祖的支譜，但也是順應這個演變而編成的。

(四) 宋帝昺傳說的加插

筆者是在2000年開始在衙前圍村進行口述歷史的搜集，不過在進行實地調查時，從吳九鄉長口中聽到的竟是一個有異於吳氏族譜的「開基」故事——一個與宋帝昺有關的傳說。他指出，衙前圍村吳、陳、李三姓祖先，其實是13世紀初逃難到南方的南宋小皇帝宋帝昺的大將。當時，吳、陳、李三位大將，合力護送這小皇帝南下九龍，於是在現時的衙前圍村定居下來。故事不止於此，在往後的日子，吳九鄉長仍一直致力加深衙前圍村和宋帝昺的關係，例如在2003年，面對新聞媒介，吳九表示宋帝昺曾一度在衙前圍村居住，他說「七百多年前，宋帝昺南逃，到達九龍，首先便是在衙前圍居住，可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宋帝昺怕狗，當時村內的惡狗極多，皇帝不堪其擾，被迫改遷他處。皇帝亦被該村的惡犬嚇走……至今〔衙前圍村的〕犬隻仍稱『皇驚』」。¹⁰而在2005年的另一次訪問，吳九甚至指稱圍門上的「慶有餘」牌匾，相傳就是宋帝昺所親題。¹¹雖然吳九鄉長從未解釋何以吳氏族譜一

直沒有將這些重要的淵源記載下來，但作爲衙前圍村的發言人，吳九鄉長的言論卻深深地吸引著到來採訪的新聞記者，於是在整個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初，本地報紙中有關衙前圍歷史的報導，均牽連到宋帝昺事蹟。

其實吳九鄉長不是第一位將宋帝昺傳說附會到衙前圍村的人，在1974年前鄉長吳渭池也有類似的言論，他說：「爲首到這類『梔棒船』去當海員的，是靠近港口九龍城一帶（衙前圍、沙埔、候【侯】王廟、宋皇台、黃大仙等地區）的勞動人民，這些勞動人民，都是遠在宋朝年庚【間？】隨宋帝南逃下來的隨從的後裔，他們聚居九龍沿海一帶，其中以吳、李、陳三姓爲絕多，他們本來都是以自耕自食的漁民和農民自居，相互團結依靠，還談不上有很大的剝削存在。那時到船上去從事商運工作者，不外是水手，雜務等工作。」¹²換言之，吳渭池認爲衙前圍原居民的吳、陳、李三姓的祖先，就是宋帝昺南下九龍時的隨從。由此看來，吳九鄉長不是首先附會宋帝昺故事，只是他說得更爲完備而已。

夏思義（Patrick Hase）由此深信宋帝昺與衙前圍有著深厚的淵源。¹³在有關衙前圍的研究中，他努力地將口述歷史和族譜之間的分歧作出調和及補足，從而詳細描述衙前圍村的前代歷史。夏思義認爲，吳氏成爲宋帝昺的追隨者最有可能是吳成達的曾祖父吳三樂，三樂居於東莞縣吳家涌，到14世紀中葉，吳成達與父親吳從德才遷進衙前圍村。不過夏思義認爲，在吳氏遷進衙前圍，陳氏應已在那裡定居了二百年。他根據陳氏在1999年編寫的《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勝/泰/學賢族譜移來》指出，陳氏的一世祖名陳俊卿，原籍江西，乃紹興八年（1138）榜眼，拜相尙書左樸射，同年章事兼樞密使，封魏國公，後被派居廣東南雄居住。陳俊卿的兒子夢龍爲二世祖，遷居廣州新安衙邊鄉。到十世祖昌隆，被明政府任爲副總司官，而十一世朝賢則被明政府自新安衙邊鄉調至九龍防守，「是爲九龍之過江祖也，〔也是〕後派居衙前圍村之始祖也。」而昌隆的另一兒子國賢則分居於衙前壟。¹⁴根據這部族譜，夏思義推論陳氏早在1150-70年左右已居於

衙邊鄉，到1350年左右，吳三樂的曾孫吳成達也遷入該地。再過二百年，約在1570-74年間，也是到了陳朝賢一代，衙邊鄉的村民（吳、陳、李）在衙邊鄉加建圍牆，衙邊鄉遂成衙前圍。¹⁵筆者認為，對於這一類的鄉村史料，學者必須十分謹慎，尤其是為甚麼陳氏會在1999年編修族譜？並將副本送交衙前圍村村公所（這是研究衙前圍的學者們接觸該族譜的地方）？顯然，這新史料的出現，與衙前圍的發展重建有關——似乎當圍村面臨遷拆的時候，陳氏也欲藉著族譜，表明他們的祖先同樣是歷史悠久的衙前圍原居民。

有關宋帝昺在九龍的傳說，的確一直在古老的九龍地區流傳，而九龍城的宋王臺巨石，也一直被當地人視為宋帝昺曾作駐蹕的證據。羅香林更為此作了非常詳細的考證，指出宋末帝昺在今日九龍及新界大嶼山等地，建立行朝，忠臣義士，從者甚眾。但終於格於時勢，流離瑣尾，未能興復。¹⁶不過近年歷史學者開始對這個事蹟提出疑問，例如鍾寶賢便指出，直至19世紀，有關宋帝昺的事蹟，一直只停留在宋王臺的傳說上，但經過20世紀初清末遺老的「深化」和歷史學者的「考證」，宋帝昺的事蹟變得愈來愈清晰和具體。¹⁷

筆者相信，關於宋帝昺在衙前圍村的事蹟，包括吳、陳、李的祖先乃宋帝昺的大將等等，基本上只限於吳渭池和吳九兩人的理解。首先，除了他們的言論外，這個說法並未有出現過在衙前圍村的其它記錄上。1948年衙前圍村重修天后宮時所造的碑刻曾提及宋帝昺：

我九龍衙前圍天后古廟，歷史遼遠，奇蹟彌多。自宋帝蒙塵，追隨扈從，駐蹕茲土，甘棠遺蔭，奠址斯成，雖兵燹疊經，而棟梁不壞，即風雨剝蝕，而梁仍支。闔鄉生靈，賴其樾蔭者，垂七百餘年矣，迨清雍正間曾加重修……。¹⁸

但是照此碑文的意思，當年追隨扈從宋帝昺來到衙前圍只是天后而已，三姓祖先因為得到天后的護蔭，遂於村內建立天后廟，並於雍正年間

作出重修。

我們在其他村民的訪問內容上，也看不到宋帝昺的淵源。1982年，科大衛教授曾領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在衙前圍村作過深入的實地調查，並訪問了住村內村外約9名年逾50的吳氏村民。¹⁹從這些訪問稿中，雖然有關衙前圍歷史眾說紛紜，例如有一篇訪問強調首先來到衙前圍村定居的是吳氏，指出吳成達是宋末時候的人，本在大陸捕魚，但不喜歡這種生活，遂留在九龍以種田為生，後來陳姓和李姓的祖先又來，他們先在山邊建屋，後來的發展是三姓聯合建村。²⁰在另一篇的訪問中，被訪者透露衙前圍組成之前，不止於三姓，除了吳、陳、李外，還有車姓和翁姓，「前三姓來得做【早？】，有幾百年歷史，後二姓遲來，不過一百年，且兩姓後裔甚少。」²¹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被訪村民提過圍村與宋帝昺的關係。在本文下筆之際，筆者也向在衙前圍土生土長的吳佛全先生（71歲）請教，吳先生表示在兒時已從長輩中聽聞許多有關宋帝昺在九龍的故事，但從未聽過這個宋朝皇帝與衙前圍有任何關係。

這批1982年的訪問稿中也提到「慶有餘」牌匾的來歷，同樣與宋帝昺無關。據當時的村中父老所說，牌匾位置以前是「炮樓」。²²吳少川（1982年60歲外）則懷疑「慶有餘」三字為紀念打勝「紅頭賊」而寫的。²³吳詠棠先生（1982年約60歲）和吳子芳先生（1982年67歲）認為「紅頭賊」攻打衙前圍村是在清初發生的，當時紅頭賊四處打家劫舍，要村人交出穀物，衙前圍是大村，合力作出抵抗，雙方激戰，最終因村中的銅炮發揮了作用，殺死了二、三百名紅頭賊，衙前圍村亦得以逃過大難。²⁴吳送發先生（1982年68歲）甚至認為衙前圍起圍之初，就是為了防避紅頭賊，圍的四角各建炮樓，上置火炮，而為加強防衛，圍下四週也挖了數十英尺深的水塘等等。²⁵這個說法，與「廟史」碑刻中描述吳、陳、李三族是在清初雍正二年（1724）共同建村開井而居頗為吻合。

結合以上的證據，所謂宋帝昺在衙前圍的故事，只是兩代鄉長的個人理解而已。不過，宋帝

昺的故事被附會到衙前圍村的歷史上，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的。

(五) 祖先事蹟與土地發展的關係

我們已不清楚吳渭池在甚麼環境下將宋帝昺的故事附會到衙前圍村的歷史上，但作為鄉長，吳渭池與吳九所面對的問題有一點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在市區重建下衙前圍村的改變。吳渭池在任鄉長期間，香港政府要收回吳氏宗祠的土地，吳渭池為了這個事件，多番與本地官員交涉，甚至上訪廣州向曾生市長和陳郁省長尋求支援。²⁶

吳九鄉長將宋帝昺與衙前圍拉上關係，則正是這條古老圍村面臨全面拆卸危機的時候。1994年，香港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經過詳細勘察後，將衙前圍評估為沒有古蹟特質。這個決定的作出，是因為香港的法例著重單幢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強調物料結構和工藝上的歷史真實性，對於曾經改建但是又有重要社會文化意義的建築物或者建築群，難以在法例上作出保護，而衙前圍村村內，大部份房屋卻經過重建，城牆、護城河和吊橋也早已在村中消失，加上許多房屋因為日久失修，面貌已呈頹敗，於是委員會遂對該村落作原址保留並不可行。²⁷ 1996年，香港政府批准專門為政府進行市區重建計劃的公營機構土地發展公司（俗稱「土發公司」）對衙前圍村進行收購和重建。²⁸ 在衙前圍村，超過四成的土地包括村內小巷根本就是公地，所以土發公司只需收購圍內房屋的業權，便可進行重建。但實行起來也並不容易，首先，全圍約有130間房屋，但分散成114個業權²⁹；其次作為公營機構的土發公司在行政上有欠靈活，在土地收購的行動上往往不及私營發展商。若干年後，吳九鄉長對記者有以下的說話：「當年土發派個鬼頭同我傾，我問佢公司有幾多營運資金，佢話總共得二千幾萬作收購經費。咁少，我都費事同佢講。」³⁰ 到1999年，土發公司表示將在地盤上興建住宅樓面積三十七萬四千方呎，提供650個單位，公司更與村民磋商以「業主參與發展」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不過，當土發公司還在政策討論的階段，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

長江實業集團（簡稱「長實」）屬下的子公司已經陸續收購不少村屋的業權。³¹

以吳九鄉長為代表的衙前圍村村民，對於遷拆的態度有兩個層面：一是爭取最佳的搬遷賠償；二是同時希望政府可以將衙前圍村作為古蹟完整地保存下來。但在以上的形勢下，要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是困難的。站在業主來說，私人發展商的出價必定比較吸引，例如在2002年左右，自「土發公司」改組而成的香港市區重建局（簡稱「市建局」）向原居民提出一項賠償方案，市建局以物業面積計算，每方呎以當時市值賠償。面對市建局的出價，已經在村內取得逾五成的長實立即提高收購價：一屋換兩樓加三十萬現金方式，限業主在一個月內答覆。³² 但隨即的問題是，相較於屬於政府公營機構的市建局，村民將更難說服長實將衙前圍村完整保留。事實上，長實也以「購一間〔屋〕、拆一間〔屋〕」的行動企圖令村民打消這個念頭。³³ 雖然處於這個形勢下，吳九鄉長仍然希望市建局能向長實和個別業主的房屋全數買下來，再將鄉村重建保存。

吳九鄉長一直致力希望保留整條圍村，筆者自2000年進入衙前圍調查，已發現鄉長不斷地向到訪的學者、學生以及記者解說宋帝昺與衙前圍村的淵源。他所做的，無疑是將衙前圍的歷史與九龍的傳說結合起來，使社會人士相信衙前圍的歷史就是九龍的歷史，而支持保留這個村落。即使到2003年1月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明確重申，政府以圍村大部份屋宇已清拆，難以修復舊貌，決定放棄將圍村列為受保護古蹟，³⁴ 吳九鄉長仍未放棄，他隨即召開「護村大會」，並請來了立法局議員、黃大仙區議員及數名學者到場聲援，向外界講述衙前圍村的歷史和保存這條古老圍村對香港市民的意義。³⁵ 同年他向記者表示衙前圍村村民仍稱犬隻為「皇驚」，乃因當年宋帝昺住在衙前圍村時，曾被犬隻驚嚇云云。³⁶

保存衙前圍的氣氛是在2004年開始改變。3月，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立法局重申衙前圍村因為經過近代大規模的改建，不符合法例保護的範圍；而到8月，長實集團已增持圍村村屋業權達百分之六十八。³⁷ 不過最大的轉變是，連吳九

鄉長也於這年將祖屋賣予長實，這使他難以再代表餘下的原居民業主在市建局和長實進行磋商或談判。2005年10月3日，衙前圍村原居民業主、業主、居民、商戶共同發信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暨全體區議員，副本並送市區重建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民政事務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信件指出：「現在有些反對重建衙前圍村的人士或議員，他們都是沒有業權在本村或非住在本村的居民，重建或保留與他們沒有直接生活上的影響；³⁸ 【我們原居民業主、居民業主、居民、商戶，不同意整條衙前圍村列作古蹟文物保留】，我們與市區重建局經開會商討後接受重建加保留方案，把村內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保留，重建後可命名為衙前圍村中心或廣場（須經各方認可），這樣照顧到居民、業主及市區重建局各方的意見。」³⁸ 文中所謂的村內有歷史價值的文物指天后廟、門樓及「慶有餘」牌匾。這個新保留方案，顯然較吳九鄉長一直所要求的小規模得多。但作為鄉長，吳九仍然作出配合，所謂宋帝昺親題「慶有餘」牌匾，便是他在10月底告訴記者的。³⁹

衙前圍村現時可能已不再需要宋帝昺了。2005年11月，應衙前圍原居民業主、居民業主、居民和商戶的要求，黃大仙區議會通過，支持衙前圍村納入市建局重建項目，市建局亦表明，會立刻啟動重建程序，盡量配合村民的意願，同時承諾會保留村內的三件古蹟。⁴⁰ 而一個月後（12月26日），吳九鄉長也與世長辭。不過，在過去十多年間，經過報紙傳媒的輾轉廣泛報導，衙前圍村的三姓祖先，以及它的「慶有餘」牌匾，也有可能成為宋帝昺在九龍事蹟中的佐證。

(六) 結論：浮動的祖先記憶

天后宮內「廟史」碑刻所說雍正二年（1724）吳、陳、李三族姓氏建村開井而居，極有可能是衙前圍正式建立起來的時間。當然，這並不表示在這之前該地沒有村落。事實上杜臻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行《粵閩巡視紀略》一書，其卷二提及「衙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行的《新安縣志》中，在今日九龍地

區也註有衙前村。⁴¹ 顯然在1724年建圍之前，該地已出現衙前村。不過，這衙前村的居民是否就是吳、陳、李三姓？或是否只得該三姓？就不得而知了。

吳、陳、李三姓在雍正二年合力建成衙前圍，顯然為了防禦海盜。沿海治安不靖，是清初的遷海政策造成的。清朝立國之初，為打擊鄭成功在台灣的反清勢力，於康熙元年（1662）命令東南沿海邊界內遷50里。幸好康熙八年（1669），清廷批准廣東省復界，北徙7年的九龍居民也可回鄉了。⁴² 不過，朝廷雖復界，但對許多離鄉的居民來說，回鄉居住仍然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原因是，當年遷海措施所針對的台灣鄭氏，在1684年投降前還非常活躍，因而由這股反清力量而起的海盜問題，在廣東復界後仍一直騷擾村民的生活。正因這個緣故，九龍彭埔圍在1676年因遭到海盜攻陷，結果圍內村民無一生還。在當時世局混亂之下，九龍竹園村林氏依仗著同是林姓的大鵬營管隊的保護首先在九龍定居下來，他們族人甚至很快分支至附近的蒲崗村，擴大生活範圍和耕種地。⁴³ 九龍的治安一直是地方問題，即是在1684年後，海盜的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所以吳、陳、李三姓需要遲至1724年，在居住地加建了圍牆，才能真正的安居下來，而衙前圍村民也從此流傳建圍以抗紅頭賊的故事。

宗族與定居是兩回事，宗族是以追溯同一祖先的過程，達到聯盟和排他的目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19世紀初的嘉慶初年，一些居住在衙前圍及其週圍地區的吳姓村民，已透過修墳，嘗試建立一個以日玄祖為祭祀中心的宗族結構。但吳氏宗族的擴大則在光緒二十年（1894），當時日玄祖子孫，成功地與當地其他吳氏結成更緊密的聯系，在這前題下，以九龍始祖吳成達為祭祀中心的吳氏宗祠隨即建立起來，下分廣玄、東玄、泰玄和日玄四房，共成衙前圍吳氏一族。

宗族組織既已確立，吳成達是甚麼時代的人反而成為次要的問題，而且時代模糊，更司令故事有發展的空間。在早期的敘述中，吳成達有被說成是明初的人，但當近年圍村面臨遷拆的危

機，他又成了追隨宋帝昺南下九龍的大將。浮動的祖先記憶，正正就是明清以來華南宗族的結構特色。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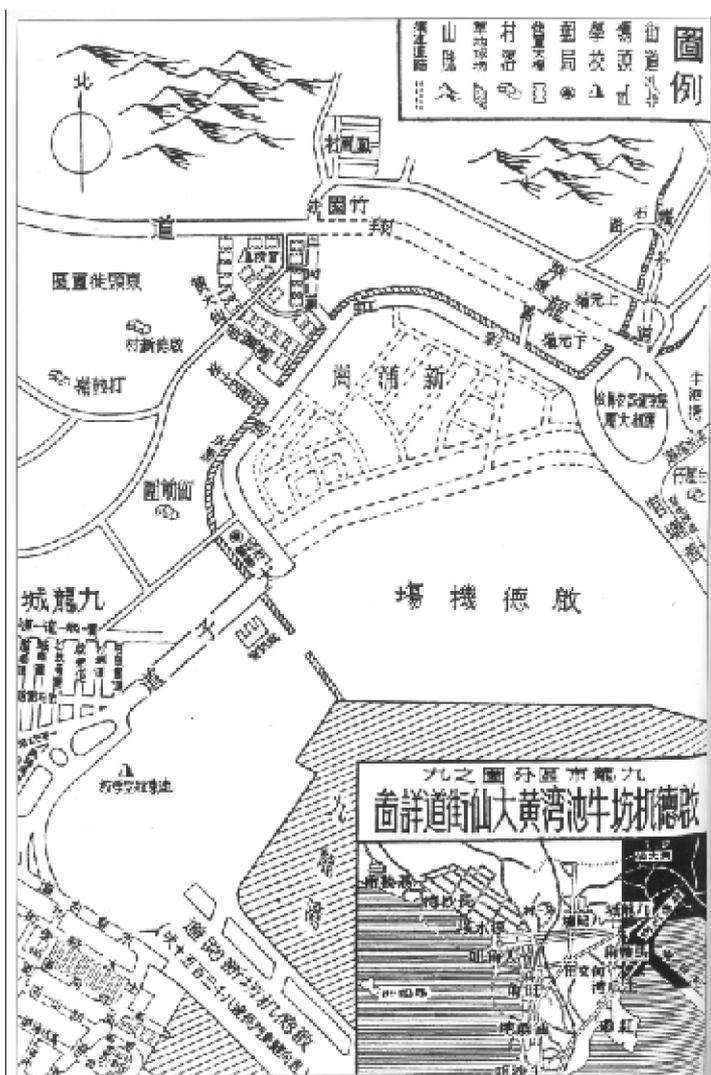
- ¹ 《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1986)，頁7-8。
- ² 明清的法律規定，除了貴族和品官之家，庶民不得建祠祭祖。
- ³ 據衙前圍村民吳送發先生(1982年68歲)在1982年的記述，「吳家子孫分兩種，一稱延陵，由大婆所生；一稱渤海，由細婆所出。」「【吳氏】宗祠所掛的皆是延陵，沒有渤海的。」(參考〈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 若果那是指衙前圍村內的情況，那意味那時當地還住著另一群來自不同祖先的吳氏。
- ⁴ 族譜中的其它有關吳居厚的部份也出現嚴重的矛盾，包括指出他是宋嘉佑進士。考嘉佑是宋仁宗1056-1063的年號，這時吳居厚還沒出生。
- ⁵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出版，2003)，頁190。
- ⁶ 李富，〈關於九龍城衙前圍立村之事蹟〉，收入《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香港：九龍十三鄉委員會出版，1982)，頁17。
- ⁷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90。所謂「七約」，是指七條鄉村組成的互保組織。這七條鄉村，包括衙前圍村、沙埔村、大磡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壟村和衙前墾村。
- ⁸ 有關這個問題，可參考劉志偉，〈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教歷史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51。
- ⁹ 《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1986年，頁35。
- ¹⁰ 《新報》，2003年9月16日。
- ¹¹ 《星島日報》，2005年10月24日。
- ¹² 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1974年。
- ¹³ 夏思義指出，衙前圍村的父老曾對許舒(James Hayes，60年代曾到衙前圍村作實地調查)和他

(約在90年初開始在衙前圍作調查)講述吳、陳、李三姓祖先與南宋朝廷的關係。(參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9 (2002), p. 62 [footnote 13]。)但夏思義沒有說明，在許舒和他本人前後兩次的訪問中，告知他們宋帝昺故事的是否就是吳渭池和吳九兩位鄉長？

- ¹⁴ 《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勝/泰/學賢族譜移來》，1999年。
- ¹⁵ 參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pp. 1-15。夏思義認為衙前圍最初建圍的時間應該是在1570-74年間，他考慮到新界大圍是在1574年建圍，而大圍的父老告訴他大圍建圍的風水師是從衙前圍建圍後請過去，故得出如此的結論。見上文頁9。高添強對衙前圍歷史的見解與夏思義相近，參考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頁45-93。
- ¹⁶ 羅香林對此有詳細的考證，參考羅香林，〈宋王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收入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頁67-108。
- ¹⁷ 鍾寶賢，〈緒論：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收入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頁1-29。
- ¹⁸ 「重修天后碑記」(1948年)，衙前圍天后宮內，見於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77。
- ¹⁹ 筆者特此感激科大衛教授借出訪問稿參考。
〈衙前圍村吳健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1日)，訪問人：麥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芬。
- ²⁰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
- ²¹ 〈衙前圍村父老〉訪問稿(1982年5月15日)，訪問人：科大衛、麥瑞珍、李宜芬、黃永豪；整理：麥瑞珍。
- ²²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5日)，訪問人：麥瑞珍、李宜芬；整理：李宜

- 芬。
- 23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10日)，訪問人：科大衛；整理：麥瑞珍。
- 24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日)，訪問人：李宜芬、麥瑞珍；整理：李宜芬。
- 25 參考本專號的〈胡渭池傳略〉。
- 26 《明報》1999年8月4日；《立法會：「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動議辯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發出(2004年3月24日)。
- 27 《明報》，1999年8月4日。
- 28 《信報財經新聞》，2004年8月3日。
- 29 《壹週刊》，2003年1月23日。
- 30 《明報》，1999年8月6日。
- 31 《星島日報》，2002年3月19日。
- 32 《香港經濟日報》，2006年2月10日。
- 33 《東方日報》，2003年1月18日。
- 34 《太陽報》，2003年1月26日，筆者也有出席。
- 35 《新報》，2003年9月16日。
- 36 《立法會：「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動議辯論》2004年3月24日；《信報財經新聞》2004年8月3日。
- 37 《衙前圍村原居民業主、業主、居民、商戶要求市區重建局盡快開展衙前圍村重建計劃》2005年10月3日。
- 38 《星島日報》2002年10月24日。
- 39 《香港經濟日報》2005年11月9日。
- 40 游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頁16。
- 41 同上，頁16。
- 42 張瑞威，〈宗族的聯合與分歧：竹園蒲崗林氏編修族譜原因探微〉，《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28期(2002年7月)，頁1-8。

圖一、1961年衙前圍位置圖



華僑日報編，1962年《香港年鑒》所載之黃大仙地區圖。轉引自游子安等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頁22。

吳渭池傳略

吳渭池口述 梁錫麟筆錄(1974)

一、出生

1884年4月1日，我誕生於九龍城衙前圍村一農家，祖先遠在南宋年代遷到九龍來謀生，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了，遠祖歷代都是從事農、漁業生產的，到我父親的一輩已是第23世祖了，家境貧困，父親從事耕耘，農閒時間在渡船上工作，母親理家務，飼養一些家畜，付【輔？】助生計，因為家境困難，十歲時才開學，但只上了一年「開蒙」，在十一歲時因母親在一次過海取飼料時，不幸遭大風，木船被大風打沉，遇難無救，喪身大海，被迫綴【輟？】了學。次年又因父親染病身亡了，父母雙亡時我才十二歲，因無親人照料，更因年紀幼小、無勞動力，只好代鄉鄰放牛，為求賺得溫飽，就這樣苦熬地熬過了四年，於我十六歲時那年由朋友介紹，始到了一家人行船館宿舍去做工，先是做茶房，後來調做伙食，前後約一年多，又由一家行船館宿舍的海員工人介紹落了船做什務。自此，我便開始了數十年的海員生活。

二、海員生活的四十年

1901年間，由朋友介紹到一艘德國商船「地亞時」號工作，初頭月薪三元，兩月後增到五元。在該輪工作前後兩年餘，最後加薪至七元。當時該輪是行駛山東的青島、煙台等口岸的。

1903年，轉到「黃忠」號，該輪亦屬德國商船，後改名「貴州」號，行駛南洋一帶，只有一兩千噸，在「貴州」號約一年一次，船回港後，放了船，改轉到一家英國船公司屬下的商船「變窩力」號任職，該輪較前兩艘為大，有三、四千噸，是行駛歐、亞兩洲，所到之處為星加坡、馬來亞、仰光、亞丁、印度、庇能、蘇伊士運河、倫敦、利物浦、比利時等埠。在該輪首次被升任二管事，歷時約兩年，月薪為12元，一次船回

港後再放船。離開了「變窩力」號，到了花旗船去。

於1906年，到了一家美國郵船公司太平洋郵船公司名下的郵船「德哥打」號去，該輪當時行駛亞洲、美洲，到美國斯亞路、德甘巴、上海、橫濱等埠，有兩萬噸，係當時大郵船之一，因一次船由上海駛往日本時在橫濱口觸礁壞了，幸好人身平安。於是不得不又離船，在輪上任職前後還不到兩年，因船毀被逼放船回港，重回「變窩力」號，兩年後，終於1908年，當一次船再回到香港時，放了船，休息一些日子，轉落昌興輪船公司名下「中國皇后」號郵船任職。當時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時時半途也接到請我放船去為他的公司船做事的電報，致於去船，是不愁的。因此就有了選擇的機會了。這次是我初到「皇后」船工作，因為「皇后」船待遇較好些，船又是較大的，行駛埠頭很多。不過「中國皇后」號當時與「德哥打」號基本同綫的，行駛加拿大、香港、上海、橫濱等埠的。當一次船由加拿大開往日本時，不幸又在橫濱口觸礁毀爛，在該輪任職歷時約兩年，又離船了。到此告一段落，屈指不覺已在海上生活已有十年，十年來兩次船失事，且剛好又在同一處，迷信的講句，這真是不好的兆頭呢！幸好，每次都是有驚無險的化險為夷，這次也總算平安回來了。

1909年，係我跨進廿六歲的一年，在日本參加了「聯義社」。因當時任職的「中國皇后」號在日本遇事，只好離船乘搭當時停泊於日本的一艘美國太平洋郵船「西伯利亞」號回了香港，接着便留在「西伯利亞」號，該輪行駛日本、香港、橫濱、上海、檀香山、三藩市等埠。約兩年後，一次船返香港，又離船。為了走埠去澳洲，又轉到一艘德國郵船，該輪當時係行駛澳洲的，經菲律賓到香港來，在輪上工作時間最短，任職

不到一年，月薪為15元，船回到香港便告離船，同年又轉到加拿大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較大郵船「俄國皇后」號去，當時月薪達廿元，該輪航行與「中國皇后」號同，有壹萬捌千噸，在船上歷時四年，終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因該輪應征，運兵去了始離船。上岸逗留兩月餘，目的辦理「海員慈善會」的組織，事妥後始再落船，先復到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郵船「亞加多」號，當時該輪專行駛美國三藩市的。在船上過了四年，過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俄國皇后」完成了使命，回港後，復回該輪，再過了兩年。多年在海上飄泊，爲了休息一些時日，終於1920年離船。同年轉落中國郵船公司屬下「拉路」號去，該輪當時行駛三藩市、檀香山、香港、上海、橫濱等口岸，也有萬噸以上，兩年後於海員大罷工一度離船，復工後，終於1922年離開「拉路」號轉落到太平洋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大郵船「威路辰總統」號去，該郵輪當時是環球行駛的，到經世界各大口岸，所到的地方很多，包括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印尼、亞丁、錫蘭，蘇伊士運河、好望角，阿力山大、紅海、黑海、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地中海、蘇聯、東非、西非、南非、巴拿馬運河、古巴、美國等廿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輪上幹了三年。到此，廿多年來海上生活，略剩到一點錢，在朋友的縱容下，到了上海打算從事經商，但因無經商經驗，不到三年，把辛辛苦苦積得的一些錢，就這樣虧蝕了，生意失敗後，因無別的技藝旁身，不得不離開上海，再回港落船工作，先到「比亞時總統」號去，該輪係太平洋郵船公司一艘客船，當時行駛三藩市、檀香山、日本、菲律賓、上海、香港等口岸的，前後又過去了三年，當我五十歲那年，又告離開了。離開了「比亞時總統」，轉落了「加拿大皇后」號，那時月薪達25元，該輪爲一艘大郵船，是加拿大輪船公司名下的，當時行經溫哥華、檀香山、菲律賓、日本、上海、香港等口埠的。在該郵船是我行船以來最高薪的一艘，又是歷時最久的，達七、八年之久。就在我五十七歲時離開了，從此結束了我近四十年的海員生活。不久，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了，該輪又因戰事，應征運兵去了。四十年來前後落過：比亞時、貴州、變窩力、德哥打、中國皇后、西伯利亞、俄國皇后、亞加多、拉路、威路辰總統、比亞時總統、加拿大總統等不下十餘艘商、郵船做事。隨船到過世界五大洲，跨渡過太平洋，踏遍了各國著名大埠，所到過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加拿大、美國、古巴、英國、比利時、德國、法國、蘇聯、荷蘭、澳洲、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紅海、黑海、阿力山大、東非、南非、西非、葡萄牙、婆羅洲、越南、印度、緬甸、錫蘭、亞丁、新加坡、馬來亞、好望角、地中海、菲律賓、朝鮮、中國等數十處。

三、在上海的三年

1924年，海員大罷工潮後，轉落到「威路辰總統」，三年後放船，離開了香港到上海與友人合伙經營酒樓飲食生意，因缺乏從商經驗，幾個月過去了，業務總是平平，始終無進展。

次年、五月中，上海、青島各地日本紗廠先後發生了工人罷工的鬥爭，當時的運動主要係爭取國家領土的主權，不甘外國人的橫行無忌，規模很大，遭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鎮壓，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傷工人十餘人，同年5月28日在青島又發生類似事件，當時反動政府屠殺了八名工人。5月30日，上海學生兩千多人行動起來，在租界內宣傳聲援工人，號召全國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隨後糾集了群眾萬餘人，在英租界捕房門首，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遭英帝巡捕開槍，當場槍殺了許多學生，成爲著名的「五卅慘案」，這次大屠殺即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到處發生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形成極大規模的反帝運動。當時商人罷市，原來首先由街坊組織起來的，當時我也參加了街坊的組織，責成總商會舉行罷市運動，支持工人、學生的正義行動。一時氣勢澎湃，到處起來運動，這次事件是我終生難忘的。

1926年係我經商的第三年，生意更日見艱難，不務發展，但守業也不易，惟是一日望一日的好轉，望呀！望呀！月復月，年復年。就在這

年某月接船上海員工友的通知，得悉陳炯明軍閥部下的一名軍長洪兆麟這個殺人王因事欲與上海宣【孫？】傳芳議事，來「比亞時總統」由香港出發，途中被該輪海員韋德，取了大□伯自動手槍、槍殺了，事後，該海員因知不能逃避終吞槍自儘，船到上海，被棄屍在碼頭上，因政治嫌疑無人認領，衛生局也不受理，被攔留岸上多時，爲了收殮該海員，我曾與上海「聯義社」交涉，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與上海海員工會交涉，以死者乃屬海員，工會有責有權殮理，不管他政治嫌疑不嫌疑，爭取了工會接受辦理，後來移葬廣州，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矗立了韋德烈士墓碑。當移屍到廣州後，廣州當局略施仁義，捐出了五千元作喪殮自儘烈士海員，有了喪殮費用，廣州各有關團體復又爭着要求辦理，這件事說明了當時社會的一些人的勢厲【利？】與矛盾。此事給予我很大的教訓。不覺在上海過了三年，到實在站不住了，不得不結束了從商夢想，可是經年所賺得的一點餘錢就這樣經營酒樓短短三年化得血本無歸。結業後只好又回到香港，從操舊業——到船上去。

四、從事各項活動

1909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組織了「聯義社」，聯絡廣大的海外進步群眾及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人仕。首先物色了一些進步的海員做聯絡工作，海員工人因爲盡是跑埠的，有條[件]接觸僑居外國的愛國華僑，又因當時反動政府勾結帝國主義，不管本國或日本等的郵寄檢查甚嚴格，稍有政治嫌疑者，查到罪大不可饒恕的。所有機要文件均由海員傳遞的，我當時在「西伯利亞」皇后號任職，就在那時候參加了「聯義社」，從事對外聯繫工作及攜帶文件，甚致【至】運彈藥，掩護革命黨人進出日本。當時參加了「聯義社」的海員也不少，因爲他們都是爲資本家服務的工人，被視爲「下等人」，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待遇，和外國人的諸般侮辱，只是敢怒不敢言，在覺悟上提高的較快，也易受到當時革命的潮流影響，自覺地認識到國家的貧窮是自己受罪的根源，都深恨當權者，要行動起來，掌握一切鬥爭

的武器，所以對當時的「辛亥革命」都有不遺餘力獻身於革命。那時候，革命的醞釀正濃，但白色的恐怖也是非常厲害，反動派到處捕人。有一次，船到日本時，接受了一次護運過一個被視爲「猛人」出境，原來該要員本來係潛在日本從事地下工作的，因受到了日本當局的特務注意，無法展開工作，並隨時會被遞捕的危險，孫中山爲了排除該要員的境況，決意設法把他送出日本，後來找我們商量，派人護送，結果船上派了五位海員上岸，把一個留下，把那要員化裝爲海員冒充我們的同行者連夜上了船，但終被日特探到疑跡，翌晨派憲兵追趕上船檢查，幸好我們早把他藏好，藏在煤倉裏，係敵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擺脫了羈留。在上海英租界上了岸。

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的統治，但由於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內由腐朽的軍閥掌握政權，勾結了帝國主義，把革命的果實斷送了。中國海員工人與中國千百萬的勞苦大眾一樣始終無得到絲毫解放，相反，趕走了封建的統治，換來了一個十足的半殖民地統治，外國人在中國橫行無忌，資本家變本加厲的剝削，海員工人仍然在資本家與封建殘餘的買辦階級、包工頭的重重殘酷壓逼下生活，待遇是非常苛刻的，終年累月在海上航行，每天要幹上從十一小時至廿小時的工作，還時時受到了白人的諸般虐待。那時，我正在英商昌興輪船公司屬下的一艘郵船「俄國皇后」號任職，該輪當時係跨渡太平洋到溫哥華的，船上有四百多名中國籍的海員，生火部與管事部各半，可是組織力還很低，不曉得爲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及找出與資本家作鬥爭的途徑，只是在痛苦的勞役中摸索。當時，船上正好來了一位新工友，原來是琳□幻影社劇員，演得一手好戲，參加了海員工作，發揮了他的優異性，在辛勤勞動之餘，教工友唱戲，湊起船上有興趣的工友組織了娛樂的組織，醞釀準備排演一套白話劇，向琳□幻影社借來劇本，經過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居然把一套話劇排演出來，係當時眾所欲望的大喜劇：「火燒馬棚」。演出結果尚算合情合理。經過一番的籌備工作，工友們都表現集體的精神，原來上演的道具和用

具無不是工友自動借出來的，為一次富有人家的衣著得來均不易的，結果透過集體想辦法，都解決了。這套諷刺大喜劇上演了，它活生生的諷刺了當時香港買辦商人的糜爛封建生活，劇中人是描寫一個大商人——陳大龍，他在賽馬的一天，拿了錢打算去馬場賭馬，誰料他出門後，碰到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被邀帶請到了澳門去，在賭博、嫖妓的紫醉金來的地方留連忘返，恰好這天火燒馬棚，燒死了幾千人，他的家人幾天不見他回來，都誤以為他早入枉死城，在家請了南無【喃嚨】道姑打齋開表，正當妻妾在欲生欲死的痛哭中，他突然從外面回來，家人一時誤以為鬼魂出現，都嚇得相告奔走，南無【喃嚨】也嚇得驚惶失措，順手拿走了枱上的肥鷄溜走了。觀眾亦非常喜歡這個戲。

自此，船上的工友通過這個話劇的活動推動起來，片斷的文娛節目此後時時都有演出，在互相學習底下，彼此都有所提高，後來竟組織了一個成熟的粵劇組，從事公開演出籌募社費及船上福利費，及致【至】抗戰時支持抗戰呢。

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年，九月間「俄國皇后」號船上有一位工友，名叫麥成，在船由香港開往日本，途中得了嚴重的病，送了上岸留醫，約一月後病癒出院，當時這位工友到神戶昌興輪船公司事務所去要求安置，但遭船公司推絕，留在異邦、毫無依靠，只好行乞街頭，後來幸得一家華人辦莊（九八行），以鄉土的親情暫時收留了他在莊上膳宿，不致落薄【魄？】，若不然那後果不難想像。船由溫哥華再到神戶後，他立刻回船向工友訴述情形經過，要求船上收回他，船上工友知道後很為他抱不平，由幾位熱心工友出頭向船方爭取，經一番的週轉始被同意了。自此，又一次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了大家，船公司、資本家係怎樣把我們看待的，將來誰也難保不會再出這樣事件，若遭此情，不病死也得餓死了。大家自覺的要求保障生活，彼此必須團結一致，並應讓其他海員工人都知道這件事有所準備，但為何進行呢？一時未曾定奪。

同年，一次船到溫哥華的時候，我們趁船有

十天的停泊，在船上台開了一次工人大會，可以講是海員工人第一次集體開會，報告了麥成工友的遭遇實況原本，並由我建議組織了一個「公益社」，規定凡社員在航行中途遭遇到意外或疾病時，大家應同舟共濟，為疾病較嚴重需要入院者，由社撥現金三十元以傍身，其他津貼看實際情況而定，其義務由每人每渡船納社費一元，得到了船上工友一致的贊成，並踴躍參加了社，並由「俄國皇后」號海員工友聯合具名去信到「亞洲皇后」、「日本皇后」、「滿提高」號等各輪，號召中國海員共同行動起來，組織保障自己生活的團體。初步在各輪辦了一些「書報閱覽社」，首先提高工人文化生活，使大家思想複雜起來。

1916年，經過了兩年的醞釀，辦社的事宜終於妥了，各輪即派人上岸組織註冊定址等工作，我也放了兩個多個月假辦理組社工作，直到辦妥了註冊始落船。原來當時香港當局法例中並無社團組織條例，只有一些慈善機關存在，不允我們的申請，結果，為了這個團體實際的存在，只好改頭換面以「海員慈善會」再去申請，才獲批准註冊，從此在岸上組織了海員工會的前身，當時發動參加的合格會員就有三千之眾。致後來在「反對包工、反對無理剋扣」致【至】所以成功是「海員慈善會」的初年時代的重大考驗。

1920年，辛亥革命由資產階級領導迭次的失敗，主因革命政權掌握在軍閥手裏，互相排斥，各自割據稱霸，孫中山又由國內逃到日本，檢討了失敗經過。後來受到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欲從新組織革命力量，實行改組國民黨，並與共產黨聯合，提出「中國革命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儘管當時一些右派分子反對，但由於對大勢有利只好暫不好反面，改組是成功了，提出了三民主義，並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向當時較其他軍閥為薄弱的廣州軍閥着手，開始實行徹底打倒軍閥，又向各地張羅一番，組織了廣東農民，當時我正在中國郵船公司屬下的「拉路」號工作，也曾盡過一點力支持過當時的革命，就在一次船到三藩市時接駐美革命黨部人的委任，把一批子彈運回漳州，經我手者有一公

噸用番梘包裝藏在中心分成十多箱，連同我本人在檀香山私下購了兩箱炸葯運到香港駐港的夏仲文收轉漳州作圍攻廣州之用。當時所有彈葯的□□均隨身帶付的，還刻了個偽圖章，用「x x 隆」名義收貨的，爲了救國護亡，膽子也壯大了，現在想起來爲當時的冒險行徑和感見也甩一把汗。

1927年，離開了上海回到了香港繼續在船上工作，前後又過了十年。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參加了黨。此後大戰一天天的趨緊，東方有日本、西方有德國、法西斯及意大利，到處點火，戰火到處蔓延，中國的許多地方在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手裏白放棄了，實行徹底不抵抗的讓敵人較易地侵略、屠殺。實行在中國施其三光政策，「燒光、搶光、殺光」。當時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境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子弟軍，只好擔負起這個大責，面向敵人，積極抗日，與敵人勢不兩立，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據當時的抗日隊伍係在敵、偽、頑的三重敵人反攻下產生的，環境非常險惡，但在自己的政黨領導下，有強大的中國人民支持及國際友人的多方幫助，越打越強，前仆後繼，一個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敵人雖強大且兇狠，但終於是獨立的，它們無人民的支持，相反所到之處都受盡人們咀咒。那時候，我正在「加拿大皇后」工作，爲了配合國內人民抗戰，盡自己的一點微力，在船上轟轟烈烈的展開了籌募工作，宣揚抗日的意義，得到船上工友的同情支持，每截船頭都能籌得壹兩千元救濟傷兵難民。並在舊金山開了一次同仁大會，大大地開展救濟傷兵難民的募捐工作。接着又支持抗日隊伍，爲人民軍隊中的新四軍，八路軍及東江縱隊，前後十截船頭，歷時兩年，每截船除了在船上演戲籌款外，還發動了進步的海員工友到岸上去，到其他船去。一番的運動，船上工友都認識到抗日的意義，自動戒起賭來，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應做些有意思工作，捐款支持抗戰。每次船回香港後還把募捐芳名及捐款數額登報宣揚。

1939年冬天，趁「加拿大皇后」號入塢大修，有三個星期修補，發動了船上卅多位工友組

織慰勞團去惠陽慰勞東江游擊隊，並帶有毛毡、藥品、膠鞋、香煙等慰勞品一批出發，大家又選了我爲慰問團領隊團長，出發到了惠陽，見過了游擊隊隊長曾生等，受到了熱烈歡迎，共進晚飯，互相慰問，非常興奮，現在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到了惠陽當晚還開了7個歡迎大會，會上由曾生隊長發表歡迎詞，表示全體隊員熱烈歡迎我們。正當我上台代表答謝詞時，突然被遠處一陣陣轟隆轟隆的飛機聲終止了會議的歡慶，馬上有計劃的分頭疏散躲避，事後無繼續了會議，各人分別到各家寄宿去。原來慰問團由香港出發，一時浩浩盪盪，引起特務注意，跟踪了我們，有下毒手的機會，當晚好不容易才守過了一夜，早飯由我們捐出了數頭生豬，並分別在六百多名游擊隊內同歡共食。飯後接着補開了大會，當會議把歡迎、歡送一起解決了，本來我們打算逗留三幾天的，但爲了避免引起敵人注意，結果決定當天便辭別了東江縱隊，各自回來。誰知，我們回來竟引起船上一些人的不滿。落船後，遭當時船上中國海員的工頭楊九的白眼，本來事前我是請示過他，得他同意的，原來他積恨在心，只是無機會攻我，這次雖偽意同意，原來是他之蓄意陰謀。他結果以我搞到船上工友瘋顛起來，今日又話籌款，明日又話慰勞，不安心像過去一有閒暇就聚賭的生活，攪到船上工友看得籌款戲來，捐得錢來，無錢來聚賭，他無「□」可抽，借此在洋大管事面前，說我的壞話，船上開除了我，又開除了船上參加演戲的工友，沒奈何離開了船，回到家裏憤恨地帶了一子一姪起程去東江交了給曾生，參加了游擊隊，當時香港有幾家報紙還刊登了消息，登了大字標題：「送子從戎」表揚我。

五、戰時護鄉鬥爭

1940年，結束了海員生活，回到了故鄉衙前圍村，先是送了子、姪去東江，回來後着手改組了祠校：因祠校辦得實在不成體統，簡直成爲一所學店，前時因無暇辦理，現在都有機會了。於是召集了鄉親父老開會研究祠校實況，決心把它改組，當席選舉我爲校長，又把祠校命名「吳族義學」，以新組織申請註冊，辦理一切有關事

宜，幸得南方學校派來教員四名來（三男一女）協助辦理一切並負責執教。此後，改用了正氣的課本，改變了教育的方針，使至結合時代的實際的需要。當時，義學改組後日教小學，夜間組青年國語進修班，使成長青年有學國語機會，當時日夜就學人數添了許多，達兩百多人，義學的經費當時主要來源靠祠堂撥來每年兩百元和收每學員每月五角堂費，來維持的，但又因就學者盡是自己的子姪之輩，家境多半非常困難的，實際連五角錢堂費也很多無付，兩百多人只收得拾元式拾元，所以當時在經濟上僅賴在那兩百元開銷、又要支付教員薪金，又要開支學校一切費用，經濟是捉襟見肘的，摶節開支，達到再無可省的了，就這樣千般艱難的堅持渡過了兩秋。

日本南侵迅速的蔓延着，香港終於1941年10月8日淪陷了，義學就在戰火來臨前夕結束了，當時，又是一番疏散工作，燬燒公籍等工作。接着戰爭帶來了混亂到處打家劫舍，麻煩又多了，爲了本鄉的安全，刻不容緩，召集了鄉親組織維持會，防止□人趁火打劫，有機可乘，在有條理的緊密組織下，產生了維持治安的隊伍，由鄉中青年員負責起，編隊分班，有紀律，有組織，平時輪流值班，遇事一同對待，鄉里又委了我爲鄉長，主持鄉中戰時一切事務，由於全鄉合作社組織嚴密，維持了當時混亂秩序，保證了鄉民的安全，其他鄰鄉遭打搶、放火、蹂躪，非常荒亂，但我鄉確保無恙，當時，許多附近的「出嫁女」都回娘家來避難。一時各處雲集，滿鄉婦女、小孩。自衛隊的責任也增加了不少，一些有錢的圍外人，見我們治安好也來要求保護，避免遭打單、搶劫，爲了保家保鄉，做得到的我們都做了，各處人等均來要求留在鄉內，獲得保護，一時人多又複雜，爲了保證不出事故，不但加強晝夜執行警戒，還發進出鄉證件，定規則由進出鄉檢查，派出男□站崗於村口，進出鄉男女老少人等一律檢查，因戰事到處缺糧，爲了杜絕米糧出鄉，爲暫時住在鄉內的人，爲要接濟家人的，也得煮熟飯帶出去。這樣一直維持了數月，不出事故。直到日本大隊進港後，治安稍爲安定了。在日本人壓力下，不得不緊縮了保安工作，依然派

有青年值班、還保留維持隊，緊守鄉內秩序，每逢日本人進鄉檢查仍派糾察隊持棍追隨，並派人領着日本憲兵逐家去，防止壞人擾亂秩序。接着爲了安全和當活，一面四找出糧食，找工作，跟日本軍方諸般的交涉以要求配給米糧鄉民，並首先爭取了十大麻包大米來給鄉民續炊、每戶分得三斤，我家也不例外，爲了確保糧食以後的供應，不惜交涉到日本司令部，當時，面向敵人要糧食，有□與虎謀皮，實在危險得很，但爲了不挨餓，使鄉民免遭劫運，身受所托，碰死也得走出，憑着我略懂日語的方便，結果爭取到每戶按人口申領有糧証，派出的工人做工有飯食，基本解決了一時食飯的困難。當時附近各鄉都因我鄉各種優待，感到奇怪。我們就這樣幸災樂禍艱難地渡着時光，困難是重重。後來日本人爲運兵南下，要把啓德機場擴大，實行遷拆附近各村，並限期三天要拆。消息傳到後，即通告鄉民聯合交涉，但限於命令既下，無法收回。當時只保住了現在的衙前圍村，拆了上、下沙埔、浦江（蒲崗）、新、舊□坑，上、下元嶺，石鼓嶺，打鼓嶺，沙地園、豬屎寮等一帶，無法保了，後來只好要求安置，結果把啓德路、啓仁路，啓義路、長安街等四條街給鄉民權且暫居，不久該四街又告要拆，弄到無法收拾，被迫求見於日本總督，結果被批指現在九龍塘模範村及錦田。模範村是當時得名的，那時候該處爲一片荒地，由我極力爭取下，要求補償損失，始由日本人搭回石屋，並委我爲此處村長，此後，村民各等事宜均由我身負。爲另一處，即錦田，因乏人出來交涉、日本人只草率地搭回了一些木竹棚之類交鄉民了事，因木竹棚不耐風雨，不久毀了，不能住人。

次年，世事不以人們的意智【志】所能轉移，儘管我好意爲之，竟有些埋沒良心之徒，不惜把我出賣了，指我係有問題人物，曾參加過組織，帶子姪參軍，並在香港淪陷前夕協助盟軍勢力退出香港等幾項檢舉我。當時日寇特務四出暗地捕人，我參軍的子姪數人從東江回到九龍被捕，不久我亦被捕了。我的子姪數人就於我被遞捕後於赤柱監獄就義了，我因「罪重」不能饒恕，在殘酷的刑罰下，幾次死去活來了，但敵人

始終不肯放過我。後來因在我口裏得不了什麼，又經外面朋友四出運動，用了數□之作爲擔保、求情。敵人見眾人力保，始准我出獄。從死神挽回來的我，因幾經折磨只得奄奄一氣，當時許多人都以爲我回天無望，非常失望。經眾人的小心救護下，從不能飲食慢慢地恢復過來，未等身體完全復元，家人及友人幾番勸我離開香港，免遭□捕。我心思：敵人之所以放我，係勢指我無藥可救的，現在還魂了，豈有不後悔之唸【念？】。結果留走相持之下還是走爲上着。離開了香港回到內地——惠陽。在惠陽從事海員戰事時形的組織，直到香港光復了，始回來。

六、恢復工會鬥爭

1945年9月1日香港光復了，普天同慶抗戰勝利。經過幾年殘酷的戰爭蹂躪，生還的人們都從四面八方回來了。我也與一些工友由內地回到了濶別多時的故里，香港到處殘垣垛垛，石礫迭迭，一片淒涼的境狀蓋與人們勝利歸來的喜氣，立刻飛向九天雲霄了。幾凡隻身歸還者，家中人不知去向，有戰火中死去，有因饑寒交迫餓死了。化悲憤爲力量，死不去的人們都發動起來，團結起來。我們從內地回來，急不容緩，策劃恢復工會事宜。但赤手空拳談何容易呢？一連串問題發生了，首先碰到的係經濟問題，幾位合力工友也是家徒四壁的，每講組會資金無、連糊口也成問題，大家商量之下，一方面派人找工作，一面組織有關事務，我要求出去工作，但工友們力挽，要我留在復會，他們去謀事，取得工資作經費。於是我也不好爭執，設法向友人借貸一筆經費，先是借了兩百元作爲工會建設費，結果賣了四巷橫屋與曾造廷200元，償還借款。又連借帶霸的要了友人一層樓來作會址，當時設在廟南街132號四樓，由家裏搬來椅凳數張、一些茶具、碗筷用具爐灶等，拿不出或不夠就借。就是這樣白手興家的把工會辦了個大概模型，爭回了「香港海員工會」的招牌，經過幾番的申請備案工作，每日四處出走，費盡□舌，在幾位知己的工友大力支持下，工會是恢復了。當時的生活是非常刻苦的，經濟上到此還是真空的，復會成功開同仁大

會又向外借了三百元。後來許多工友都陸逐回來了，一些無家可歸的工友竟搬到工會來，直到找到工作始離開。工友們找到謀生路數後，均酌情的支持工會的生存，致後來逐漸清還了各項費用的貸款。原來工會主席李發，因申請註冊以他名義，復會後就由他主理，我次之。但因在執行會務時有岐(歧)見，我不滿他處事的先已後人，把工會的利益放在其次地位，於是經常從傍(旁)提出指正，本是同志之言，豈知弄巧反拙竟成爲忠言逆耳，視我爲眼中釘，相持之下，不久因事徹底破裂了，我被逼辭了職。就這樣把辛辛苦苦辦起來的工會，托以他負責了。決定從農，再回到故居，在石鼓窿開荒辦了一個小型農場，變賣了家業，添置農具、建住所，前後經過近兩年，正當辦得有點端倪時，突接一遷拆的無情□。原來香港政府爲了擴充飛機場跑道，把我辛辛苦苦所置的一切收了，只補回二角錢一呎的青苗損失算了。後來它竟以近百元的出賣了。當時曾力爭合理補償，但不得要領，再一次血本無歸，儘(盡)付東海。那時後我已經係六十四歲了，重回故居衙前圍，一時主意未定，又幾接工會派人要求我回去理事，共同發展工會，原來那時候該姓吳的早不在了。因我辭職後他因無人敢重(從)中挑剔他的所爲，更是變本加厲了，結果弄到大敗工會利益，被工友除了。我知道事情的本沒【末】，很爲心痛，決定回去共事，先時任執委，次年同仁大會選了我爲主席，此後連任八屆，每推都被工友們挽留。工會經過十多年來，得全體工友的愛護支持，獲得了大大的發展，購有物業樓宇數層，除工會辦公所外，港九辦有服務部、九龍辦有連層的俱樂部，更辦有飯堂，港九兩地還辦有子弟管教班達數百名學生、組織達兩千多人的家屬福利互助組和組織了家屋訪問組。使海員工會的大家庭逐漸壯大鞏固起來。現在擁有五十多位職員辦事，最近還實行了一次加薪。舉辦福利達十多項，提到□□。參加了工會的香港工會達四萬之眾。工會的基礎是鞏固了。我也終因年事高大、責任重，又以工會基礎穩固了屢次要求辭職，一再被工友挽留，直到前年，我七十五歲那年始被接以辭職，但挽留我任工會顧問，有事好

找我商量協助，辦理會務事宜，工友的盛意隆隆我怎好推辭呢！我無條件的接納了。瞬眼又過了兩年了，兩年來也歷盡(盡)滄桑，辭了主席不到數月，受車撞傷腿部，經月醫治，終因年老血力遲緩，雖醫為不回復，有助手拐杖。迷信的講句，真是「福無從【重】至、禍不單行」，又患了一場眼疾，得工會工友的支持和關心，義務把這次患疾化險為夷。

七、退休的生活

接東頭邨木屋區大火後，當局為重建該區，安置災民，建徙置區。我宗祠在重建區中心，當局強行收地，要我拆「祠堂」。實行提高圍圓，地台，每大雨必水浸我宗祠，被逼與當局交涉。當時的華民政務司陳樹青，為向政府邀功，軟硬兼施，迫我族氏就範，分化族中為利是圖者，當時處理祖堂事務司理吳魚池，其為我等接受當局搬拆祠堂條件，把宗祠與學校分開，由其控制，我組織族人據理交涉，當時由外壓力很大，迭次會議，我說服族人同意由內部改組，分四房委出司理向政府辦理註冊，魚池身屬長房，其以一房司理身份與其他三房司理共擬族務。我因年事高，由【又？】負責工會顧問，日常許多會務實際分不了身。推吳有發為村代表、鄉長，我授權他處理一切村族事宜，魚池反對，放棄長房司理，堅持為吳成達祖唯一司理，後只好邀請長帝興等同意，委華友為司理，二房東興，三房泰顯，四房兆川，吳有發為族總代表。我據曾在樂善堂聽過當時參加條約簽署清朝唯一廣東採花出身官位侍部陳伯陶向九龍地區鄉紳訓示，據拓展專條所定，官府不能任意奪民產，特別係山墳、廟宇、祖屋，外軍事用及公共事業外用不可，但也係與民商議，賠償滿意為止。為此我曾與吳有發到廣州見曾生市長，陳郁省長及法院尋求支援。從原來宗祠八千多呎地及餘地共約萬呎，補回至德學校，吳氏宗祠，在村後。由原來5604分拆為7434、7435地段，屬吳成達祖管理，學校只規定辦學，24班房，每班45人共1080學位，吳氏子弟80個免費學位。（當時為津貼學校，每學生收五元學費，一元堂費）教職員由原來漢師同學

會成員主理，計有丘伯康、鍾熙然、黃志□、陳雄彬等，當時立約，尚得當局口頭同意宗祠後公園為校園，學校側設教職員泊車用地。後來因校園變用途，被罰收回，泊車場改為2D號等巴士總站，被迫泊車村前。

1962年學校、祠堂落成。最令我反感為祠堂建時規定紅牆、綠瓦，原來的油柒【漆？】，非特製琉璃瓦，及開光費用尚未撥到，據撥數為當時壹萬港幣，但宗祠只擺入祖先牌扁，開光後已無錢加高圍牆，貸款興建，繼當局城市發展，收地拆村，先後上、下沙浦村及附近祖業□地。又引起分產爭執，幾經商議，分□按房分，分□按丁分，分□置產產業收租作春秋二祭、修墳、助學等用。日玄祖及位榮祖註冊為有限公司，管理、置業等事項，正當一切就緒【緒？】，與發展商商議時，即發生67事件，地價大跌、物價上升，原來30多萬元可起物業，只好與建築商再議，只建唐樓六層，閣仔四間，其時港英與親台派勾結打擊愛國人事，到處拉人，我當時回國內暫避。後因□發建□□□僱□，只好冒險回港辦理簽收手續，跟進工程。成立管理小組，辦理出租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核數等□，□如不休生活、壓力不少。

1970年當祖務安頓好，學校又出現問題，吳法任首任校監，魚池一直反對，為司理事到處投訴，上函到美國舒【樞？】密院，長房司理是華友在穗，簽署文件不便，援權其長兄吳長福代行，又費一番程序，72年吳法病逝，校監問題又引起爭議，幸好建校時成立族內校董會發揮作用，當時任職校工吳錦陵暫當校監，基此，族中父老反對，最後推退休警界吳福，他在社會有一定名望，誠繼任適當人選，正值至德成立拾年，大事修葺，發刊紀念。學校保持發展，學校成立男女子籃球隊，在校際當中每奪獎牌。祠校到此應屬高峰，對外界聯絡也廣。村內每次天后誕等活動，師生參予工作，關係當好，祠堂在條件許可也提供助學、獎勵。好景不常，廉政公署成立，葛栢事件爆發，吳福因害怕牽連，申請移民，校監一職又費思量，只好由四房司理吳兆川兼任 j 。

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

吳渭池口述

梁錫麟筆錄(1974)

自鴉片戰爭後，香港在英國統治下，驅使了中國的人民，把香港從一個漁港開闢為一個商港，百多年來，逐漸成為世界航運一個遠東的鐸【驛？】站。

據我們的祖先告訴我們，在航運史上，遠在有了英國之桅棒船□□的年代起，香港和沿海的島嶼，就有一群勸勞勇敢的勞動人民，參加外國船舶遠洋航運的工作了。

那時候，海洋上的交通工具，還沒有機動的船隻，只有一些英國「桅棒船」，作為商品運輸的工具，這種船隻是木製的船身，配以三桅的帆，沿着海洋的岸邊，借風作之字形的駕駛，航行到香港來，大型的有五六千噸，小型的也有二、三千噸。它們到達了香港的鯉魚門外，還要用小火輪拖進港灣裏去。

為首到這類「桅棒船」去當海員的，是靠近港口九龍城一帶（衙前圍、沙埔、候王廟、宋皇台、黃大仙等地區）的勞動人民，這些勞動人民，都是遠在宋朝年庚【問？】隨宋帝南逃下來的隨從的後裔，他們聚居九龍沿海一帶，其中以吳、李、陳三姓為絕多，他們本來都是以自耕自食的漁民和農民自居，相互團結依靠，還談不上有很大的剝削存在。那時到船上去從事商運工作者，不外是水手，雜務等工作。

同時，華南近海惠陽、寶安一帶地區，當時一些農民，也因不甘滿清政府的腐敗和官僚、買辦、地主、土豪、惡霸……的重重壓迫，被逼離鄉別井逃來九龍謀生的，也逐漸到了這些「桅棒船」去要求出賣勞力，承擔各種繁勞的海上生涯。的確，當時這些「桅棒船」正方興未艾，需要一批體魄強健，富有氣力的勞動者，去擔當航行的工作。從此出海的人數漸增了，當時他們每次出海航行，往往一去一兩年不等才回港一趟。隨船在海洋上飄泊，有的到印度；有的到西歐，

甚至美洲，便成為一群最初出海的中國海員工人。

由於中國海員，具有勸勞和勇敢的特性，以後帝國主義者的繼續擴大東侵，海上的交通工具日益發達，帝國主義者只要付出低廉的工資，便能購買到出海的勞動力了。香港逐漸變成為他們雇用海上運輸勞動力的鐸【驛？】站了。於是，中國的海員，也從帆船時代轉到汽船時代，在上一世紀中葉以來，一直擔當着世界航運上光榮的工作。

中國海員的早期活動

從1909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組織「聯義社」聯絡全中國海員，物色進步的海員骨幹負責擴大海外聯系，當時郵寄檢查深嚴，所有機密文件均通過可靠的海員傳遞，據當時所通往的地區，包括有：西歐、美洲、香港、南洋各地。由於海員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受外來侮辱又深，為搭船華人即使付出頭等的票價也不能得到□□人同等待遇，不能進餐樓作飲食等事情盡入他們的眼簾，懷恨日深，加之他們身受種種不平等待遇，受白人打罵是常事，為慣例，船到埠時一定要醫生檢查始能上岸，船隻即使到了自己祖國口岸——上海，不管天氣如何，甚至零下數度也罷，中國海員只好老早地站在甲板上脫下外衣服褲依次接受白人醫生作體格檢查，否則休得上岸，海員對此都表示非常悲憤，所以在覺悟上和集體行動上的自發性要求一般較強，後來孫中山先生時常提到海員是中國革命的前鋒，對辛亥革命起很大作用，是有道理，當時的海員參加那些救國護亡的工作，的確表現得非常活躍的，非常興奮的，參加了「聯義社」組織為數也不少，在實際工作考驗中紀律性也很強。那時我們正在隸屬於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西伯利亞」船工

作，也加入了「聯義社」，從事交通、運輸、傳遞等工作。每載船一到橫濱即秘密派出代表往「聯義社」取聯繫，帶口訊文件等到各處聯絡中外愛國人士，甚致【至？】擔當掩護革命委員進出日本逃生工作，記得先後兩件事，一次有一位革命黨組織委員在日本受到監視，無法開展工作，並有隨時被捕的危險。結果孫中山先生找與海員商量，設法護送出境，船上即派了五位海員上岸以留下一個的辦法把該委員化裝冒充海員的同行者，逃上船上，留下一海員即連夜乘車追趕上船，這次是很為危險的，下船翌晨日本官方即發覺，馬上派出憲兵追踪上船檢查，幸未被發現，原來當時船上海員們上船後即做了準備掩閉工作把該要員藏在煤倉裏，僥倖蒙混過者，後來在上海英租界上岸。事隔多年，約在1920年夏天（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的影響，孫中山先生的「中國革命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的思想，效仿蘇聯，再度進行二次打回廣州，並聯合廣東農民行動起來，以陳炯明、許崇智、鄧仲元帶兵自漳州出發。）那時候，我們正在中國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郵船工作，一次船到美國舊金山（三藩市）時駐美中華革命黨部派人與我們商量辦理運輸彈藥接濟漳州行動。當時經我等手的就有一噸子彈以番梘包裝用箱由□把子彈藏在中心的方法，連同我私人在檀香山購得炸藥兩大箱私運來香港，載□隨身帶付，船到香港交載紙在香港的夏仲文由他向船公司辦理提供手續，並作轉運漳州事宜。

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由於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內由腐朽的軍閥統治，勾結了帝國主義，把革命的果實斷送了，中國海員與千百萬中國勞苦大眾一樣僅僅剪去了一條辮子，同樣是沒有得到絲毫解放，仍是在帝國主義者、封建買辦、包工頭殘酷的壓迫下，去過着冒着風浪枯寂的海上生活。那時候，國際海洋的運輸已經發達了，有了現代化的郵船和各國的貨輪，香港的海員工人，就在這些船舶上，擔任水手、管事部、艙底的生火工作，已成爲一個廣大航運的產業工人。

可是當時中國的海員多在外國的輪船上工

作，由於外國的資本家通過中國封建的買辦階級和各層包工的重重榨取下，待遇是非常苛刻的，一般海員工人，終年累月的在海上航行，在驚濤巨浪中，每天要幹上從11小時至16小時的工作，加之常常受到西人的欺負、虐待、挨打、挨罵，生活非常難過。

那時，英商昌興輪船公司屬下的一艘郵船「俄國皇后」號，是一艘橫渡太平洋到溫哥華的大郵船，船上有四百多名中國籍的海員，其中艙底燒火的就有二百多人，餘外是管事部工人和船面的水手，當時，船上的海員工人，還不知道組織自己的工會爲保障職業及照料家屬的要求，各海員工人雖然也一天天的多起來，可是組織力還很低，也不曉得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鬥爭，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工作待遇，只是在痛苦的勞役中抱恨。

海員工人在海上的生活尤其是枯燥的，天天見到的只是看到天連水，水連天，和聽到的只是一起一伏的巨浪發生一驚人的聲音，令到人情緒的□□，爲了改善這種生活，船上剛好新來了一位琳望影社的劇員，參加了海員工作，勞動之餘教工友演節目，調理身心，經過一段不長的時間，指導工友去排演話劇，由於船上的工友也非常踴躍參加學做，很快便學會了，從此改變了從前刻板式的生活。在痛苦的勞役中嘗得一點娛樂，獲得一定的安慰。記得首次演出的一齣喜劇「火燒馬棚」雖然談不上很成功，至少也合情合理的演出，通過話劇也表現了工人階級的特性。當時一切上演道具用具無不是工友自願借出來的，爲一些長衫、馬褂，甚致女人的服裝那些東西都是得來不易的。

這齣「火燒馬棚」話劇的上演，□□當時眾欲所望的諷刺大喜劇，它活生生的諷刺了當時香港買辦商人的糜爛的封建的生活，劇中人是描寫一個大商人——陳大龍，他在賽馬的一天，拿了錢打算去馬場碰運「舖草皮」，誰料他出門後，路上碰到了幾個所謂志同道合的朋友，被邀帶拖的乘船到了澳門去賭博、嫖妓，這個商人就在這些紫醉金迷的地方留連忘返，恰好這天火燒馬棚，他的家人幾天不見他回來，誤以爲他落入狂

死城，於是在家請了南無道姑打齋開表，正當妻女在苦哭中，這個「大喪家」被□回來了，家人一下以為鬼魂出現都嚇得相告奔走，南無【喃嚨】也嚇得驚惶失措，順手拿了雞溜走，觀眾無不鼓掌稱快，在話劇的活動中推動了集體的娛樂生活的要求，零碎的文娛節目此後時時有演出，逐漸發展了自發性的團結，相互學習，彼此提高，影響普及到其它船隻工友，共同進步。

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頭一年，9月間，「俄國皇后」號輪上有一位工友叫麥成，船由香港開到日本途中因患病重被送上神戶一家醫院要求留醫，住院一個月後病癒出院，這位工友便到神戶昌興輪船公司事務所去要求安置，但船公司推搪不理，致令這位工友逗流【留？】異邦，無依無靠，行乞街頭，後來幸被一家華人辦莊（即九八行）以中國人鄉土的親情，暫時收留了他在莊裏膳宿，不是後果不堪設想，船由溫哥華再到神戶後，他回到船上向工友訴苦，要求為他出頭，工友立刻要求船上將這位工友復職，經幾返【番？】的爭取方能得允，此事給予船上工友很大教訓，一致感到輪船公司這種對待中國海員工人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表示不滿，認為遭到這樣的境況，不病死也得餓死，大家都認為彼此應有互助的必要。

同年，船再到溫哥華的時候，船上工友趁船有十天的停泊，在船上台開了第一次工人大會，報告了麥成工友的遭遇，在大會上，並由吳某工友軍提出組織一個「公益社」，並宣讀了章程，雖然當時的「公益社」章程目的是很簡單，但已足够了，工會組織的前身，凡社員在航行遭遇到意外的疾苦，大家互濟互助，規定設立途中重病入院的，由社撥現金三十元以傍身（據當時30元足夠返□水時的）其義務每人每渡船只納社費一元，都得到船上工友的贊成和踴躍參加，至由「俄國皇后」號海員工人去信到「亞洲皇后」號，舊「日本皇后」，「滿提高」等各輪，號召海員工友共同組織起來，並在各輪辦了一些「世報閱覽社」提高工友文化坊。

1916年，這幾艘航行太平洋的郵船，海員的「公益社」是組織起來了，當時，由各輪派出代

表，向香港華民政務司註冊備案，可是當時香港政府的法例中，在殖民主義政策下，是沒有什麼社團的組織條例，只有一些資產階級性質的慈善團體，各輪代表的「海員公益社」的名義去申請註冊，當然沒有獲批准，後來為了這個團體的存在，改名為「海員慈善會」，始獲批准註冊。這是海員工人最早的組織，如雖然標榜着資產階級慈善的招牌，實質上，就是海員工人最初團結、互助，和與資本家作鬥爭的武力，當時發動的合格會員有三千多人，會址設於香港干諾道中永號的二樓。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第二年，幾年戰爭的洗禮，身受到戰爭帶來的奴役和痛苦的海員工人，並不似資本家的一般推想戰爭使人民馴服，使人民害怕起來，相反他們不折不撓的站起來，體會到要生活的必須要鬥爭。經驗告訴了他們在敵人面前反而是不能示弱的，不然自取毀滅。思想上是逐漸凝成的。

當時，帝國主義與及他們的走狗，以為海員工人還是「下等人」是善良可欺的，那時昌興公司的幾個大包工頭，以謝詩平、王往軒、□□麗等為首的這幾個臭台昭著的狗腿，值(藉?)着與船公司的□□，就想在昌興公司輪船中去實行包工制，滿以為這是他們主要技倆，那班窮小子是服服貼貼的。「滿提高」號與舊「日本皇后」號兩輪先後到了香港的時候，以其餘幾艘郵船較小的，「滿提高」號首先受到開刀，船上被這突然而來的一抬，一時不知所措，暫時被壓倒了。包頭實施每個工人每月要受到無理的剋扣兩塊錢的工資，違授者解僱。跟着這幾個工賊及加威的，出師有名的，到舊「日本皇后」號去，但這次意外地遭到全體的海員反對，船上二萬名海員工人一致起來為反對削工，反對剋扣鬥爭。下了很大的決心，全體離船不幹，並到岸上向海員慈善會投訴，這是海員慈善會組織以來的首次考驗了。「慈善會」馬上表示支持「日本皇后」號海員的行動，便派人與船公司交涉，不是沒有什麼結果。原來，舊「日本皇后」號工人全體離船後，大包工頭便分別進行向船館請人補充，企圖分化工人的團結。當「慈善會」知道此事後先去一

步，當晚在海員慈善會，召開了全港行船館（宿舍）會議，邀請各船館主持人參加會議，報告了事情的真相，展開了討論和要求對付辦法，會上一家大船館義和堂的主持人，聽到了報告當即表示支持舊「日本皇后」號工友的鬥爭，反對包工制，當席將舉杯擲碎，表示誓不替大包工去僱請工人的決心，其他議會的船館代表，均受感動，都一致擁護，並要求一致行動。

船公司和這幾個大包工聽到了這個消息後，他們知道所要實行的包工制度是失敗了，遭到了全港海員工人的反對，無法施其技倆。第二天，船公司便請了海員慈善會負責人頭，通知舊「日本皇后」號二百名工友，立刻回船復工，並宣佈包工制是取消了。

這樣，各輪海員工人的「反包工、反尅扣」的鬥爭，在自己的「工會」支持下，是勝利的寫下了香港海員團結和鬥爭歷史的光輝一頁。

光芒四射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給予全世界工人帶來了新的希望，到處沸騰的氣息，海員工人是先嗅到了，因為海員生活條件關係，受到海外革命的潮流影響特別早，特別深，因此，在階級的覺悟和鬥爭目標是也跟着的確鞏固起來，反帝的意志也更堅決了。

1920年，香港有了社團的設立後，各輪的海員工工人，以海員慈善會的性質，未能代表全體海員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發展福利事業，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於是有一部份先進的革命的海員工工人，按照海員的大多的要求，以當時的海員慈善會為核心發動了全體中國海員後方正在組織工會工作：經過一系列的研究和整頓，終於1921年3月6日隆重地成立了「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會址於香港中環的電車路，從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便代替了前「海員慈善會」的一切會務工作，進一步發展會務工作，更合乎了海員工工人的理想願望。海員慈善會直到了1924年自行結束。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工工人團結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團圓，掀起了撼動世界的香港

海員工大罷工的浪潮，衝激（擊？）了當時統治者的寶座，造成了現代中國工人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先聲，接着1925年反帝的省港大罷工，成為了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力量的支柱。

1927年4月12日，蔣匪幫叛變革命後，盤據革命的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具有光榮歷史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亦於1928年被香港政府封閉。

不屈不撓的鬥爭

中國革命經過了「四·一二」後，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中國海員工人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的瘋狂反撲下，並沒有因此消沉□□，雖在瘟疫船的虐殺下，又展開了團結互助的組織的活動。

1930年後，香港海員工工人，參加外國船隻工作的有昌興輪船公司四艘「皇后」船，美國大來公司八艘的總統船，太古公司七十多艘貨輪，日本大阪百多艘商船，及渣華公司二十多艘商船，連同其他各國船隻共兩百多艘，數萬海員，因為當時沒有工會，海員工工人的工作待遇，自然非常苛刻，中國海員在航行中，不管病重死亡，公司都不理會。工人的生活是毫無保障。

東昌興輪船公司的「加拿大皇后」號與舊「日本皇后」號中，有一部份的中國海員，是曾參加大罷工的過來人，還有一部份是在勞役中鍛鍊出來的新血液。他們又運用了機智，組織了劇社，通過了集體的文娛活動，去團結工友，船上組有粵劇組，並演劇籌款，購買藥箱，購置書報，提高工人文化以及展開各項工友的福利工作，當時在「日本皇后」與「加拿大皇后」船中先後就組織了「餘間樂社」的組織，「亞洲皇后」船員組織了「中和樂社」，「俄國皇后」組織了「知中樂社」性質相同的組織。

當年，「日本皇后」船中，有幾個勇敢的海員工友，不甘船上西人的虐待，合伙與其暴鬥，遂被解雇，當時船上工友，認為這幾個正直的工人，挺身為工人而爭抗，大家捐錢與他們作被開除後的生活費，他們不肯接受，感到船上工友生活也很困難，反念之下，他們終於又接受了。原

來他們設想到工友在岸上沒有一個集合的場所，把工友們捐給他們的九百元在九龍花園街設立一所「大眾俱樂部」，以便船上工友返到香港的時候，大家有個集合的地方。

除後，四艘皇后船的「樂社」社員有感擴大團結的必要，要求組織一個總社，劃一辦理船上工友的福利事業，於是經過一番醞釀後，先由「日本皇后」與「加拿大皇后」兩輪的「餘間樂社」合併，「亞洲皇后」的「中和樂社」與「俄國皇后」的「知中樂社」都改組為船上「餘間樂社」的支部。在岸上組織了總社，結束了「大眾俱樂部」，改名為「餘間樂社總社」，社址設於九龍彌敦道上。

1934年來，「餘間樂社」總社成立後，總社的幹部，都是久經鍛鍊的老海員工人，他們在風雨而飄搖中，雖遭多次逼害，都沒有絲毫的動搖，他們挺身為海員工友的大家庭辛勸工作，而他們也得到廣大海員工人的信任和維護。

1936年5月，「日本皇后」船上，發動了一次反虐待的鬥爭，船上三十多位海員工友，終被開除，而這些都是「餘間樂社」的積極份子，他們雖被開除離船後，在其他海員工友的幫助下，不

久又轉到其他船隻去，撒播下團結互助的新的種子，他們到了各輪，不但不怕受到被開除的威脅而軟化，相反，更進一步的發展了鬥爭的組織。

「餘間樂社」總社成立不到一年多，除四大皇后及部份的總統船外，便發展到首總船及其他船隻，都有了「餘間樂社」的支部，計各輪社員人數，共有三千多人。

1937年，全世界各輪中國海員工人，都渴望恢復工會的組織，當時「餘間樂社」的幹部及一部份的先進老海員工人，以「餘間樂社」為核心，重新充份估計自己的力量，掌握時機，發動了各輪海員工人及10,003間行船館，簽字蓋章，要求恢復原日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遞交香港當局，後來經香港政府的批覆，把原名改為今日的「香港海員工會」，香港海員，歷經達十年沒有自己的工會保障自己的利益，於1937年夏天，終於恢復過來，會址設在香港干諾道中統一碼頭的對面。

1937年，日寇已發動對華全面的侵略戰爭，當時世界許多進步的海員工人，對德、意、日三個軸心國進行血腥的戰爭；（缺）

更正啟者

本刊第44期中所刊登楊天保、謝振治，〈徐松石著作事跡編年考略（1899-1999）〉一文，第22頁所述「j j 1987年又寫有《禹跡華踪美洲懷古》、《漫步諸天：彙通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等著作。……」一段，文中所述《漫步諸天：彙通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一書，查實乃由何蔭泉先生所著，由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總代理，於1987年出版，原著名為《漫步諸天：匯通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本刊編輯部為此疏失向何蔭泉先生致歉，特此更正，敬請海涵諒察。

本刊編輯部謹啟

七十年目睹的東九龍社區變化

吳佛全(2005-2006撰寫)

〔張瑞威按：此篇文章，是綜合自吳佛全先生幾篇文章，標題來自我的意思，內容則沒有增刪。〕

本人生於1935年，在九龍衙前圍前面地方之踏前古屋居住，乃係吳氏宗祠第十九世吳翰高祖後裔之第二十五傳人。爲了生活，父母在蒲崗村耕田，後來又在瓦窰頭村側土地建設芽菜廠（即今天之大磡村飛機庫）。1942年日本政府要建築龍翔道，因此拆了大磡村芽菜廠。隨後遷到東頭村近九龍寨城東頭城門口，父母繼續發芽菜，將芽菜供給九龍沙埔道九龍城街市應用（今天富豪酒店位置）。可惜1943年日本要建築材料，將九龍寨城城牆之大麻石搬去建築大坑渠和飛機場沿岸，本人父母迫著遷往九龍塘模範村6號居住。當時模範村是日本所建成，同時更配給農地給村民耕種（農地：即今天即解放軍軍營所在）。1944年尾，模範村當時交通很不方便，生活很困難，又迫著遷往黃大仙竹園村正街32號居住（即今天黃大仙騰龍墟入口位置，即沙田坳道），又是務農爲生。1945年幸得日本投降，母親及本人繼續在黃大仙廟前之農地耕種（即大園區居住130號），維持生活。但是1957年港英政府在黃大仙地方發展，建立徙置區。當時如果是農民，港英政府即時批出農民自行搭建住屋及養豬之豬屋，本人再重建屋舍在獅子山下之地方（即龍翔中學位置），港英又再擴大發展黃大仙區，〔於是本人〕於1969年被迫遷往慈雲山公屋66座2044號，繼而1996年政府重建66座，因此再遷往慈雲山慈樂村樂信樓，直至今2006年，本人才有安居之所！

東九龍地區於1941年前乃係一個農村，沿岸是漁民聚居地（沿海岸線由鯉魚門、官塘、牛頭角、牛池灣、蒲崗村、衙前圍、踏前古屋、沙埔村、直至馬頭涌道）。現今之沙埔道口約一百碼

有九龍城碼頭，側有警察局和小型礦場（機場直至今柏立基醫院寶崗道口，即啓德道）。1941年有發展商人投資已建成拾條街，命名：忠、孝、禮、義、廉、恥、仁、信、智、悌。可惜於1941年後日本佔領香港，將拾條街毀滅，日本爲了建立軍事基地，擴建飛機場，由下元嶺村口築成一條大水坑，直至九龍城打鼓嶺道，環繞整個飛機場。拆遷鄉村時，當時受影響沿途有沙地園、瓦窰頭、蒲崗村之大山嶺、石鼓壟村、隔坑村、衙前圍之踏前古屋、沙埔村口側邊之土地，直到現今啓德道寶崗道口，直出大海。今天之富豪酒店乃係九龍城市集。沙埔舊村口側有一條街，命名：打鐵街。當中有「樂善堂」，也是市集，各鄉市民在市集購物及聚集場地，打鐵街很多商舖，交流貿易（如豬苗、雞苗等）、農民用之農具、鄉村建屋材料、柴舖、衣服、食品等。而沙埔道和城南道街中有酒樓，當時時代婦女們甚少到酒樓，因此九龍城地區成爲市中心和革命根據地。1941年至1945年也是中國游擊隊傳送訊息和指揮地域，使到日軍以大坑來隔絕與市民接觸，同時用蒲崗大山泥土築成新的飛機場和飛機庫。現今由蒲崗之「可立中學」直至今天之「麗晶花園」。橫行上去就是日本空軍指揮中心（即今天坪石之三山國王廟後山），並築成飛機庫。當時拆瓦窰頭村，即今天「荷里活商場」，舊大磡村對面地區，也有飛機庫和戰壕，並配合建築一座高射大炮，（即今天黃大仙警署對面也，即舊啓德遊樂場）該座大炮台曾射擊落一架英美盟軍之戰鬥飛機，該飛機跌落在「黃大仙廟」前之農民（李新）之豬屋，但當時已被燒毀，而飛機師及時跳傘，落在沙田茅達村（即慈雲山觀音廟後山），而該飛機師是英國中尉克爾，給該地區游擊隊成員帶走，送往西貢載走（該名游擊隊員名叫李石，是沙頭角鄉民，今天2005年還存在，可惜已患了癡呆症。鯉魚門鄉長羅群詳知悉【此

略述圍村

梁錫麟(2006)

〔張瑞威按：這篇文章，是由張瑞威整理梁錫麟先生的兩篇文字而成，全文已經梁先生審閱和同意，標題也是他的意思。〕

我在1936年出生於衙前圍村的小康家庭，父親任職郵務，母親賢淑略有文化，在我進學之前已教讀三字經和千字文。我六歲正式進學，但隨即因日寇佔領香港而失去讀書的機會；七歲父母雙亡，兩妹病死，家破人亡，何處入土也不知曉，終生為恨。

在我無可依靠之際，幸得契爺(吳渭池)照顧。我一共唸過四年書，之後當過學徒、小販、技工等等。我對契爺有深厚認識，並受其高尚、愛國，愛鄉，待人至誠的情操影響，自小有承繼之志，唯我行為愚忠愚孝。不過除了這個缺點外，則別無遺憾。

我一直以村族之事為己任，有時甚至令人覺得有點喧賓奪主，難以接受。但工作的過程中認識許多「導師」，獲益良多。例如在鄉事上有李棠和吳兆川，在服務社區的工作上則有陳祖澤老人家，在籌辦建醮及辦理司理的事情上多得彭振球律師，在維護小販擺賣權的問題上則有屈超。

陳祖澤先生樂善好施，樂於助人，他百歲老人，卻當了七十年義工，對社會的貢獻之大無法估量。如1983年他捐校25萬，使鄉族子孫就學。而他資助經我介紹的清貧學生也不下十人，他們現時均已學有所成，成為了律師、醫生、工程師等，我甚感安慰。

我與彭振球律師認識始於1990年初皇家亞洲學會訪問衙前圍村，之後彭律師一直義務為圍村提供寶貴的法律意見。事緣當時香港政府為著1997回歸，要求吳氏宗祠和至德小學「續契」，但那便需要吳成達祖四房司理簽署契約，問題是當時長房司理逝世、而第四房司理則已移民海外，結果彭律師協助我們辦理了有關祖堂司理選

舉並吳氏宗祠和學校的種種法律文件。此外，在1996年太平清醮的籌辦上，彭律師又教我如何開源節流，謹慎理財。可悲的是，在醮會期間，彭律師不幸逝世的消息突然傳來，而他的出殯竟與醮會的開光同一天。按照村俗，紅白事不得兼顧，故我也不敢於人前提及，也不得不在醮會上漏讀他的名字。執筆至此，心情還是非常難過，眼淚也強忍不住。

我也想起另一位共事多年且令我畢生難忘的故人——商販聯誼會超叔。六、七十年代，港人生活困難，從事小販人甚多。但在當局的高壓政策下，小販有被罰款，有入獄，有生財工具充公而失去生計。我為著幫助他們，曾向當時的官員請求幫忙。有一次，一小販在小販認可區外被檢控，所有貨物均被充公，情況不異於失業。這名小販無錢請律師打官司，超叔與我的文化雖低，書寫常常詞不達意，但時間急逼，求救無門，只有約見官員交涉。此案無律師，但我們在高等法院卻得到勝訴，據說這還是香港的第一宗小販官司。另一次，我們爭取在新蒲崗球場建熟食檔，當我們開始的時候，有人話我與超叔「發燒」，不正常，而當局又拉又趕，結果大部份小販早、午、晚都無法「開檔」，即使找葉錫恩議員幫忙也無濟於事，最後我和超叔還是成功了。又另一次，東頭村小販蘇伯因「走鬼」滑倒而令心臟病發死亡，他遺下一家數口，貧苦無依。我們為辦理蘇伯後事，遂向街市同業尋求幫忙，弄得被港英執法部警告，甚至抄錄了我的身份證資料。不過我們最終也得到同業支持，成功地為蘇伯辦妥身後事，並解決其家庭的燃眉之急。

最後，我必須要談談已故的吳九鄉長。1989年由於村務所需，衙前圍改鄉長，這時我已從事鄉村工作多年，儘管九叔長時間作海員，與村民聚少離多，文化也有限，但他卻極重視民意，有關村中族事，勇於負責，在我力薦之下，他得到

多數村民的支持而當上鄉長。九叔少年喪父，但愛村愛國，在抗戰時期，更受長輩所托，為抗日游擊隊傳遞信息，長大後從事海員工作。當上鄉長後，我與九叔一直為村務奔走，例如在1996年為著舉行第廿八屆的太平清醮，我們便先後到過石澳和沙田「取經」。九叔晚年身體虛弱，但仍然在協調族中兄弟間矛盾上努力不懈，在勞心勞力下，影響了個人健康，結果誤醫致死。在其喪禮上，致輓者不乏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和社區朋

友，可見九叔受到各方的尊重。事隔已約一年，我仍然為安置九叔的靈位苦惱，只好順此祝願九叔安息。

我認為有關圍村的保留和發展問題，不同的人因有不同的利益，觀點也因此相異。但如果處理恰當，圍村的保存也可帶來經濟發展，因為它可以促進旅遊，而且保存鄉村遺產，亦可教育後代的前人事蹟和圍村習俗。

衙前圍七約十年一屆(2006丙戌年)太平清醮醮務法事功德通表序宜

日期	農曆	時間	行事	備註
2006-9-3	閏七月十一	吉時	選緣首(杯卜)	
2006-9-10	閏七月十八	吉時	成立建醮委員會	
			登報	
			通報政府部門	
			邀請主禮嘉賓	
			開工紮作	
2006-10-7	八月十六	中午12時	發奏上頭表	
2006-11-1	九月十一	下午1時	二表	
			發請柬	
2006-11-26	十月初六	下午1時	三表	
2006-11-28	十月初八	上午11時	開搭醮棚	
2006-12-5	十月十五	下午1-5時	媽娘更衣	
2006-12-8	十月十八	下午3時	媽娘更衣	
2006-12-8	十月十八	下午3時	取水	
2006-12-9	十月十九	上午10時	啟壇解禳典禮	
			請媽娘	
			開壇請聖	
			早朝	
			早飯	
			開金榜	
			禮斗祈福	
			晚朝謝幡	
			晚飯	
			開經禮懺	
			封相賀壽	
			施食祭幽	
2006-12-10	十月二十日	上午10時	還神送媽娘	

資料來源：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協辦

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

日期：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M1室

發表論文次序

王承文教授（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廣州五仙觀研究〉

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廣州三元宮的歷史——清代廣東全真道的發展與地方官員的關係〉

志賀市子教授（日本茨城キリスト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仙館」與近代嶺南道教〉

夏志前先生（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雲泉仙館與近代嶺南的呂祖信仰〉

游子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善業弘開的梅州贊化宮——從廣東到泰國道堂研究〉

吳真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唐代內道場道士與廣東道教〉

馬健行先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
〈南中國道觀與廟宇——香港蓬瀛仙館與九龍城侯王廟之研究〉

鍾東教授（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副教授）
〈從碑刻資料看廣東道觀歷史的研究〉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 23587778、傳真：(852) 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第三十四講

清代西南「封禁」政策小考

主講：武內房司教授
日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

時間：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下午16:00-18: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第三十五講

外來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社會——以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為例

主講：黃賢強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時間：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 下午15:30-18: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第三十六講

從社會史到新文化史：當代西方史學的文化轉向

主講：蔣竹山博士
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

時間：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 下午15:30-18: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第三十七講

風華再現：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

主講：徐泓教授
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

時間：2006年11月6日(星期一) 上午10:00-12: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二樓講學廳

華南研究講座

主講：楊寶霖先生
(東莞文史研究專家)

第一講：香港常見蔬菜來華考

日期：2006年12月5日(星期二)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3362室

時間：下午4:00至5:30

第二講：歷史文獻中的東莞與香港關係

日期：2006年12月6日(星期三)

地點：香港尖沙咀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

時間：晚上6:00至7:30

第三講：香港木魚書介紹

日期：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地點：香港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時間：下午3:00至5:00

主辦：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協辦：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 23587778、傳真：(852) 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十二期)

日期：2006年11月4-5日

地點：中山大學歷史系

程序表

2006年11月5日

一、9:00-12:45

報告：陳曦（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題目：從荊江河道及兩岸河湖的變遷看區域
人地關係的演變歷程——以宋元明清
時期為中心

主持：舒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生）

報告：馬健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
生）

題目：「道」入社區——香港新界粉嶺蓬瀛
仙館的社區關係與身份建構

主持：翟曦（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二、13:30-17:15

報告：余豔（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碩士生）

題目：清初江南地區賦役問題的再探討——
以土地、人丁為中心

主持：楊惠花（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報告：閻志丹（香港科技大學碩士生）

題目：女性的聲音——一個豫東農村的花籃
會研究

主持：程潔虹（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三、19:00-20:45

報告：梁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題目：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以巴縣客
長制為中心，1681；1911

主持：陳賢波（中山大學歷史系學部博士生）

2006年11月5日

四、9:00-12:45

報告：石堅平（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題目：宗族建構與鄉村權力——以明清以來
廣州滘滘村的社會變遷為例

主持：覃百榮（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學部博
士生）

報告：雷任偉（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學部碩
士生）

題目：旅遊、環境保護和文明化——一項海
南五指山區黎族村莊生態文明村工程
的個案研究

主持：李超西（中山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五、13:00-17:15

報告：王紹欣（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
生）

題目：從閩閩到寒門——宋以降的聞喜宗族
研究

主持：段雪玉（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報告：吳四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
士生）

題目：制度困境與地方化實踐——近代江南
倉儲制度研究（1825—1949）

主持：唐曉濤（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六、17:15-18:00

總結與圓桌討論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四卷第一期（2006年4月）

專論

- 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福建興化府歷代碑銘解析（鄭振滿）
 地方傳統的建構與文化轉向——以宋金元時期的山西澤州為中心（杜正貞）
 動亂、國家認同與「客家」文化——一個贛南聚落12—18世紀的變遷史（黃志繁）

述評

- 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張瑞威）

書評

-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劉勇）
 吉原和男、鈴木正崇編，《大する中國世界と文化創造——アジア太平洋の底流》（木村自）
 Lynn A. STRUVE,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鄧慶平）
 劉文鵬，《清代驛傳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吳昱）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秦海滢）
 楊庭碩、潘盛之，《百苗圖抄本彙編》（呂永鋒）
 高發元主編，《雲南民族村寨調查》（陳賢波）
 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會と異文化表象》（卜永堅）
 Qin SHAO, *Culturing Modernity: The Nantong Model, 1890-1930*（潘淑華）
 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楊美健）

第三卷第二期（2005年10月）

專論

- 嶺南文明進程的考古學觀察（卜工）
 女性祖先或女神——雲南洱海地區的始祖傳說與女神信仰（連瑞枝）
 「割都分治」之下——明末清初潮州屬縣都圖爭端的初步分析（陳賢波）
 坡子街上的對抗——二十世紀初年城市與國家建構初探（黃永豪）

書評

-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 1942*（杜正貞）
 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吳羽）
 《民俗曲藝：天災與宗教專輯》（鄒怡）
 黃應貴，《人類學的評論》（溫春來）
 Michael F. BROWN, *Who Owns Native Culture?*（區可屏）
 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劉永華 唐慶紅）
 趙華富，《徽州宗族研究》（黃國信）
 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謝宏維）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田宓）
 Dru C. GLADNEY, *Dislocating China: Reflections on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雷仕偉）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 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1853-1938)是廣東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簿」、代理合約一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份，年結1本及商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376件公司記賬紀錄，189件銀行及錢莊票據，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 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訂購表格

歷史人類學學刊	機構				個人				學生			
	US\$		HK\$		US\$		HK\$		US\$		HK\$	
一年共兩期	50		350		30		220		20		150	
兩年共四期	100		700		60		440		40		300	
叁年共六期	150		1050		90		660		60		450	

請以 X 選出合適的項目。上述價格為折扣價，已包括平郵郵費。

開始訂閱期號：第_____卷第_____期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定價	折扣價		訂購數目	合計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HK\$80	HK\$64	US\$8	本	HK\$/US\$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HK\$80	HK\$64	US\$8	本	HK\$/US\$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HK\$80	HK\$64	US\$8	本	HK\$/US\$
			郵費#		HK\$/US\$
			(郵費# + 書價) 合計		HK\$/US\$

#香港本地免郵費，海外訂購，每本另加港幣10元或美金1元，作為平郵費用。

付款辦法：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港幣/美元* _____，支付「香港科技大學」"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港幣/美元* _____ (*請圈出合適者)

我將以右列方式支付款項：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 _____ 有效期至：_____

持咭人姓名：_____ 持咭人簽署：_____

請把書刊寄往：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Email: _____

請將訂閱表格寄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

編輯委員會啟事

在各界長期的支持和鼓勵下，本刊正進入出版的第十二年。本刊自今期開始書號更改為ISSN:1990-9020。敬請各界踴躍投稿，批評指導，使我刊繼續向前發展。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Name)：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_____

電話(Phone)：_____ 電子郵箱(E-mail)：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歐冬紅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